

TIAN JIN SHI ZHI

天津史志

2023/6

(总第 209 期)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
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
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
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目 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传承历史文脉 强化使命担当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镇志

编修工作 杨 莉 (3)

运河文化

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通波千里 万家灯火

——运河文化与城市发展”分论坛在津召开

..... 市档案馆规划部 (7)

运河是天津城市发展大动脉 郭凤岐 (9)

读志用志

回应时代需求 树立职业自信 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

——参加 2023 年第一期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

培训班的思考 夏秀丽 (14)

关于天津市地方志资源数字化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 柳 杨 (17)

浅谈志书的可读性、感染力

——以名镇志、名村志为例 赵菁 (21)

史学百家

新发现的天津《商盐坨图》 高伟 (24)

龙亭拜牌在天津 吉朋辉 (30)

天津牙粉牙膏行业的创业与发展历程 郭枫 李重生 (32)

志述津沽

河东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 曲振明 (38)

天津市东郊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吴俊侠 姜子广 (44)

梆子名角刘香玉在杨柳青 张一然 (48)

历史上的宝坻陆路交通 王宗征 (52)

蓟运河银鱼 孟昭林 (56)

信息动态

市级动态 (60)

区级动态 (63)

京津冀地方志培训会暨志书交换仪式在津举行

.....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二)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组织全市地方志系统参加第八届

全国年鉴主编线上培训班 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封三)

2023年第6期(总第209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

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吴爱民 梁 娜

岳 宏 柳 杨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号增1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TJNZ2023109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

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300册

印刷日期:2023年12月



传承历史文脉 强化使命担当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镇志编修工作

杨 莉

2023年8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在武清区河西务镇组织召开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丛书《河西务镇志》终审会。评审组和评审专家对《河西务镇志》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河西务镇志》符合《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会议宣布《河西务镇志》以高质量通过评审。作为《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的负责同志，在组织领导镇志编修工作过程中，全程参与，亲历其中，深有体会，深有感触，更是深受鼓舞，深受教育。

一、贯彻科学精神，引领史志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地方志事业关乎历史延续、文化传承，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史志意义的真正认知，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历久弥坚的初心和厚重的历史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手边常常不

离“志”。他每到一处调研，都会找来地方志细读。“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1]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2]。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他不仅爱读志、善用志，还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在他看来，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3]。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4]。正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坚如磐石的初心和厚重的历史感中，我们读懂了进行史志研究、传承历史文脉的科学密码。也正是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科学指引，成为史志研究工作的动力和源泉，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镇志编修工作才能沿着正确方向顺利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

[1][2][3][4]《习近平：“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 | “物”见初心·总书记的时代印记⑩》，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2022年9月8日。



二、领导高度重视，汇聚家国情怀

《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从 2022 年 2 月 22 日启动至 2023 年 8 月 8 日提交天津市终审会进行评审，历时一年半的时间。正是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汇聚家国情怀，成就了《河西务镇志》。

一是镇党委积极倡导。2022 年 1 月 30 日，河西务镇获批天津市第五批特色小镇（运河鲜食小镇）进行建设，在这个背景下，为传承运河文脉，深入挖掘、整理河西务镇历史文化特色，保存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展示河西务发展脉络，记录河西务尤其是市级特色小镇创建过程中的发展脉络，河西务镇党委提出，成立专门工作组启动《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河西务镇志》编修的积极倡导者，给予很多具体的工作指导和支持。

二是区委领导高度重视。《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得到区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22 年 8 月 6 日，区委主要领导一行到河西务镇调研，了解到当时正在开展《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区委书记表示，“镇志修编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须全力做好”。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分管史志档案工作的领导，也当场表态给予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全力支持。更值得一提的是，《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被区委列为 2023 年亮点工程进行重点推动和督办。

三是业务部门大力支持。此项工作得到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专门责成方志年鉴科负责同志直接进行无缝对接和具体指导，使镇志编修工作得以顺利推

进。市地方志办更是给予大力支持。《河西务镇志》历经市地方志办三审三校，每次都给予非常具体的指导和修改意见，并帮助完善志稿，这是对基层史志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支持和鼓励。

三、组建工作专班，完善工作机制

为做好镇志编修工作，在河西务镇党委的领导下，成立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组，明确工作职责。由镇人大主席任组长，总体牵头组织领导镇志编修工作，负责联系区地方志办，调动镇级资源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编辑人员一同阅稿审稿。镇党委宣传委员和分管教育文化的副镇长任副组长，在分管领域为镇志编修工作提供支持。镇志编修工作核心编写组成员 5 人，由退休多年的镇党委办主任作为总编辑，指导把关编修全过程。这位老同志对河西务镇有着深厚的感情，谙熟河西务发展历史，从 2004 年就开始从事河西务历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地方史料，被称为河西务历史发展的“活字典”。其他几位核心编写组成员作为编辑人员，主要负责镇志编写，并参与志稿审阅修改。此外，镇网信办负责整理镇志所需照片；镇经济发展中心负责整理经济发展方面资料；镇党办主任和镇团委书记负责协调提供资源服务，提供镇志所需档案文件资料；镇属国企科威华公司负责做好后勤保障。还聘请相关老同志作为顾问，根据个人在河西务镇工作生活经历提供镇志编修所需资料线索。

镇志编修工作组建立了微信工作交流群，建立完善月度碰头会制度、季度汇报制度和志稿统稿会商制度、会议纪要制度、微信工作群沟通制度等。工作组每月召开碰头会，汇报工作进度，研究解决编修过程中的问题。



负责同志每季度向区地方志办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请示编修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建议。此外，还协调镇“人大代表之家”作为办公室，供镇志编修工作使用。一年半的时间，核心编写组一共召开12次线下研讨会，共同研究和修改材料。每次研讨会，区方志年鉴科负责同志都全程参加并给予指导。其间，核心编写组无数次通过电话、微信、微信群进行沟通，加强交流，信息共享，统一思想，推动工作。

四、深入研学搜寻，求真求实记述

地方志的职责使命是存史、资政、育人。编修镇志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帮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历史遗产保护和利用，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编写组就是遵循这样的思路和求真务实的原则认真撰写镇志。在这个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国名镇志的撰写体例确定篇目结构，根据历史文化名镇的定位组织内容，对材料进行选择、取舍、搜寻、补充。为了确定篇目结构，多次研究，六易其稿，集思广益，不断调整完善，为撰写镇志填充内容搭建好框架结构。撰写过程中，需要搜寻补充的资料众多，总编辑利用这方面的信息线索，找到朋友帮助提供；其他编辑人员也发挥自身历史学科优势，在网上网下对有关河西务的史料进行搜寻印证；有一位编辑人员发挥自己党校教师工作优势，积极从区级相关部门搜集数据资料。为了更全面地收集关于河西务的史料，编写组辗转联系到天津博物馆主要负责同志，并向天津博物馆发出商请函，协助搜集提供馆藏文物史料中河西务的相关内容。天津博物馆给予无私帮助，提供了十四仓的相关文物照片，使志

稿获得了权威有价值的清晰图片。其间，编写组多次在全镇范围内发出通知，收集汇总镇域范围内人员职称和荣誉等相关信息。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向有关单位发函征集相关人物的信息。为了最终形成规范志稿，区方志年鉴科负责同志与编写组人员一同全文逐字逐句学习中志办《中国名镇志丛书编纂规范》，使志稿从语言表述到标点符号、排版格式、图表设置、照片匹配，都力求符合规范要求。在撰写志稿过程中，编写组成员都是左手边放着规范，右手边拿着志稿，对标对表进行修改完善。在修改完善过程中，核心编写组成员全力以赴，下苦功夫、笨功夫，力求达到志稿的高标准、高质量。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积极参与其中，为修改完善镇志中的疏漏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五、上级鼎力支持，专家指导有方

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得益于市、区地方志办大力支持和专家指导。镇志编修工作每向前走一步，都与区方志年鉴科负责同志随时沟通，向市地方志办及时请示，并得到及时反馈和明确意见。从前期申报到篇目结构、志稿撰写、三审三校，每一步都离不开市、区地方志办的指导帮助。在获得中志办关于河西务作为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进行建设的批复后，在市、区地方志办举荐下，有幸邀请到两位方志评审专家进行指导，专家把多年从事史志研究撰写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在撰写镇志的过程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进，而没有走任何弯路。两位专家治学严谨，克服疫情影响和天气恶劣等困难，两次深入河西务参加研讨会进行



现场指导，更多是在各自办公室帮助审阅稿件，编写组遇到问题随时求教，专家不厌其烦、耐心细致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建议，解决了撰写过程中的很多困惑和问题，使我们在史志记述方面的业务能力得到提升。

六、倾情投入与共，酿得百花成蜜

镇志编修工作核心编写组成员来自各单位，凭着对史志研究工作的热爱和情怀，利用业余时间兼职从事镇志编修工作。一年半的时间，编修团队互相鼓劲打气，共同学习提高，提升信心力量。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敬业精神可嘉。镇志核心编写组每一次集中研讨通常都是从早上9点开始，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从来没有人迟到，每一次到中午12点之前从未结束过，大家都是意犹未尽，中午在食堂简单工作餐，也是在边吃饭边探讨，有两次一直研究到下午下班才结束。每一次线上安排的工作，大家都及时回应、及时完成。

二是协调配合到位。工作上大家在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对出现的问题和困惑积极想办法解决，从来没有怨言，没有退缩。核心编写组总编辑一直为镇志编写殚精竭虑，过程中发现端倪或者问题就及时提出来，提示我们把握方向，指导我们不断调整。几位编辑人员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总编辑就带着一起上手修改调整。核心编写组人员搜集素材、拍摄照片、提供线索、印制资料等等，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相关同志提供关于镇党委政府工作资料和数据信息，都非常及时、认真，尽

可能完整全面。

三是做到统筹兼顾。镇志编修的过程经历疫情期间。每个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都承担着疫情防控的任务，其中一位同志还被抽调到区隔离点承担艰巨任务，有一段时间大家陆续感染了新冠肺炎。尽管如此，大家都能克服疫情影响，脚踏实地完成镇志编修任务。核心编写组成员从来没有提过个人困难，没有提过报酬，没有任何怨言。团队深沉的家国情怀、无私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求实态度在《河西务镇志》编修过程中熠熠生辉，成为史志研究的宝贵财富。

《河西务镇志》作为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丛书顺利通过终审，取得编修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机析理，学思践悟，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汲取信念力量，不忘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发掘运河文化，传承历史文脉。以终评会“高质量通过评审”作为新的起点，逐条对照专家和评审组的意见建议，认真消化吸收，进一步修改完善志稿，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同时，将名镇志编修工作与河西务镇发展相融合，充分展示河西务镇的“名与特”，真正守住河西务镇的“根与魂”，力争尽快上报中志办审核，尽早付梓出版一部展现河西务独特风采与魅力的中国名镇志书，成为精品工程，为河西务运河鲜食小镇建设、为武清区大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建设贡献一份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武清区河西务镇人大)



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 “通波千里 万家灯火——运河文化与城市发展” 分论坛在津召开

中国运河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2023年11月2日—3日，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通波千里 万家灯火——运河文化与城市发展”分论坛在天津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承办。天津市委副秘书长、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党委书记李晶，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纪检组组长、副主任朱旭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党委委员、副馆长宗毅主持。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党委委员、副馆长吴爱民，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于学蕴，二级巡视员赵敬义出席。

来自全国各地方志部门、有关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论文作者，全市地方志系统代表等110余人参会。

李晶向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指出，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面积1.19万平方公里，现常住人口1400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天津与运河渊源深厚，天津因河而起、因河而兴、因河而荣，运河造就了天津。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充分发挥大运河独有的文化特质，通过打造展示中华魂、运河文、津沽貌的继古开今文化长卷，塑造



文化魅力之河、生态绿色之河、社会共享之河、经济繁荣之河，将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成为再现融汇古今的运河文化带、再塑洁城水土的运河生态带、再焕共享繁荣的运河旅游带。论坛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大运河保护利用和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运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要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不断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提升文化凝聚和引领功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朱旭尧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中国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是时代赋予地方志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进一步认识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深刻把握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当好历史文化的守护者、传播者，地域文化的挖掘者。大运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



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是流动的文化遗产，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的宏伟诗篇。要强大运河所承载的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阐释，深度挖掘运河文化时代价值，推动大运河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促进新时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水利部遥感技术应用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吕娟，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研究员靳怀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夏炎，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院院长、高级工程师朱阳，天津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张红侠五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大运河水工智慧与城市发展”“依运河而兴的城市”“区域史视野下唐代运河再研究”“天津运河城市发展中的盐文化解析”“天津与淮扬——运河与南北文化沟通融合的例证”的主旨演讲。

论文作者围绕运河水系变迁、运河与城市建设发展、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运河与南北文化交融、运河文旅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交流。

(市档案馆规划部)



运河是天津城市发展大动脉

郭凤岐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历史上又称沽河、直沽、白河、派河尾、逆河、滹沱河等，它集纳百川，通达四海。中国北方的许多河流，流经天津，与大运河天津段，合成卫河（南运河）、潞河（北运河），然后在三岔河口交汇，穿过天津市中心，东入渤海。明代丘浚的《舟次直沽简彭彦实同寅》诗写道：“潞河澄彻卫河浑，二水交流下海门。”

“海河”之名，最早见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光启写的《粪壅规则》中：“天津海河上人云……”清康熙十九年（1680）始修、二十二年（1683）刊印的《畿辅通志》记载：“海河，南北运河之会流也。”此后诸河之称才为海河所代替。1966年在编制《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案）》中，首次使用了“海河干流”之称，即从三岔河口起到入海，全长73公里。

现在我们说海河，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指海河水系，一个是指海河干流。而大运河就是海河干流的主流。

一、海河水系形成前的河道变迁

天津为退海之地，距今约5500年，海浸开始后退。在退海过程中，有4次相对的停顿，每次停顿大约稳定1000年，形成了4道贝壳堤古海岸线。天津又是冲积平原，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其中有3次在天津地区入海。黄河在天津地区“入不入海”的交替，不仅对贝壳堤的形成有一定关系，而且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以及海河水系众多河流的积泥，使海岸线逐渐淤积东移。这种“退”“冲”的双重作用，使大致距今4000年的天津城区浮出海底，

展露峥嵘。

津沽宝地之海河水系，在形成之前，海河平原的河道变迁，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在全新世大海浸期间。海河平原的滹沱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水系，河网密布，支流众多，故历史上多有“九河”的记载。

二是，商周时期。黄河沿太行山东麓流经海河平原入海，今海河水系中大清河水系及其以南各水，都流入黄河；以北的永定河、潮白河水系，也进入黄河尾闾。

三是，战国至西汉时期。随着黄河的迁徙，海河平原水系逐步由众流归一，变成分流入海。其河道大致分为河水、虖池河、派水、治水和沽水系统。虖池河即今滹沱河，在北大港与团泊洼之间入海；派水即今沙河，尾闾即今海河；治水即永定河，在泉州（今武清区境）入海；沽水即今白河，经北运河在泉州县入海。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卷首中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海河平原的水系，何尝不是如此。由分流入海，到众流合一，这是发展大势。

二、天津的运河史莫忘记汉代

东汉时，由于黄河逐渐向南改道，对海河平原的水系影响越来越小，特别是曹操开挖的河渠工程，对海河水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为了进攻袁绍余部，在河南的淇水入黄河处修筑枋堰，“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使淇水导入白沟，并脱离黄河而纳入海河水系。

两年后（206），曹操为了北征乌桓，开凿平虏渠，南起滹沱河畔的青县，北上派水的独



流镇，长约 50 公里，沟通了滹沱和泲水。

同时，曹操又开凿了泉州渠和新河。泉州渠从清河北岸（今张贵庄、军粮城附近），向北穿过雍奴薮到今宝坻附近与鲍丘水（今白河）相接，长约 100 公里，沟通了清河、沽水（北运河）与鲍丘水的联系。新河是从鲍丘水与泉州渠汇合处的北面，向东穿过今州河、陡河、沂河，达于濡水（今滦河），将滦河纳入海河水系。

至此，海河平原上的 300 多条大小河流，由分流入海，又趋于众流归一，呈扇面形的海河水系初步形成。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载，“清、淇、漳、洹、滏、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就是海河水系形成的真实写照。从而织成了以海河为主体、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

常言说，天津为“九河下梢”。这既是言其河多的虚指，又是事实河多的实指。

三、隋代大运河全线贯通

隋开皇三年（583），即隋朝建立两年后，隋文帝杨坚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仁寿四年（604），杨广杀父即位，并营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命开凿通济渠。分为东、西两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西经洛水入黄河；东段起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汴水故道，至开封折向东南，到安徽宿县，再经江苏泗洪，注入淮河。这是大运河的南段。



永济渠图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又开凿永济渠，从河南武陟沁水，疏浚旧道，南达黄河，北经独流镇，通涿郡、北京。使大运河南北沟通，长达 1400 多公里。将黄河与海河、淮

河、长江等水系联系起来，“为地处运河北部，兼具河、海运输之便，富饶盐业之利的天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天津通志·大事记》“引言”）。此后，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海河水系虽经分分合合，但却保留了基本格局。

四、天津城区漕运枢纽地位有赖金代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了多个时期的多次开挖。在大运河的贯通中，静海县独流镇曾经发挥了枢纽作用。

在金朝建都北京的 61 年中，前 52 年的河漕，南来后由独流折向西北，经过冀中洼地的永济渠北段旧道，运往京城，而不经过潞河。

据《金史》卷十二本纪第十二载：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调山东、河北军夫改治漕渠”。开凿了卫河（御河、南运河）运渠，使河漕从静海独流北行到三岔河口，然后转潞水（北运河），溯流达通州，再至京师。三岔河口成为漕运枢纽。



历史上停靠在三岔河口的货船
(载大型画册《百年海河》)

由此，天津城区得以快速发展，地位更加提高。在南运河开凿不到 10 年，即金贞祐二年（1214）前，便建立了直沽寨。由此“直沽”之名始见史籍，并一直沿用至今。这里并成为畿南军事重镇。

五、直沽的海漕离不开运河

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开了海漕，江苏太仓刘家港为海漕的始点港，直沽的大直沽

成为海漕的终点港。海漕从大海到大直沽，要经过海河。漕粮到大直沽，从大船卸下后，再经三岔河口，转经北运河，用小船运往京都。三岔河口也是海漕的转运枢纽。因此，海漕依然离不开运河。

海漕春夏两季行漕，漕粮运量剧增。元人张翥写道：“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这是当时直沽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

海漕不仅运来了漕粮，而且运来了商人，运来了江南的珍货。“一日漕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张翥诗句）从而促进了直沽的人口增长，促进了直沽手工业、盐业、酿酒业和商贸繁荣。

元延祐三年（1316），在直沽设立了海津镇。直沽成为屏翼京师的军事重镇。

有人说：元代海漕，“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这是不对的。

唐代，就曾开辟了海漕。为防御北方奚、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朝在幽、蓟驻守重兵91400人，马6500匹。年需绸缎80万匹，粮50万石。由于给养庞大，当地无法筹措，唐王朝一方面在扬州置仓备粮，海运北上，一方面开挖新河取近道向幽、蓟输送。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沧州刺史姜师度于泉州渠故道开挖了新平虏渠（南起军粮城），使南来的大批军需物资，由军粮城直达渔阳。

是时，军粮城是沽河（北运河）、清河（南运河）、滹沱河（大清河）汇合入海的“三会海口”。这里是海运的转输地。康熙《天津卫志》载：“军粮城，在城东南，去城柒拾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

大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742—756）作的《后出塞》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他在《昔游》中又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

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描写了当时蔚为壮观的盛况。

当然，唐朝的海漕，既未到后来的天津中心区，又与尚未开通的大运河无关。

六、漕运舶来了天津城

明初，依旧行海漕。永乐十三年（1415），罢海漕，专行河漕。

大运河的漕运，使直沽的地位发生大的变化。

明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争夺皇位，率兵从直沽渡河南下，大获全胜。建文四年（1402），朱棣夺取了皇位，改元永乐。永乐二年（1404），明在直沽设卫筑城，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经由之渡口”，揭开了天津卫城的发展新纪元。

天津卫城，与昙花一现的“直沽寨”不同，与未能延续发展下来的“海津镇”也不同，天津城600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天津城的历史起点。

元代，元朝廷在大直沽建有接运厅、临清运粮万户府（军队建制）等衙署治所。直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在大直沽。而天津卫城，所以未建在大直沽，而建于三岔河口附近、南运河南侧，除了三岔河口是漕运转运枢纽等原因外，朱棣率部从南运河“北码头渡”渡河南下是重要原因。

天津设卫筑城后，漕运、商贸、屯田、盐业和文化等都得到了更大发展。而且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天津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形成了五方杂处、五行八作、商贾汇集、率多流寓的典型的天津移民城市，天津俨然成为一个大都市。明代李东阳在《直沽八景·吴粳万艘》中道：“万年壮丽留畿甸，千里清香上御厨。”

七、清代天津高雅文化的辉煌

清代是天津城区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天津



历史上，漕运与芦盐是两大支柱产业。

长芦盐的历史悠久。长芦，原系古漳河一条支流之名，因两岸多芦苇而得名，其治所在沧州长芦县（镇）。明永乐初年（1403），长芦盐区正式定名。

盐，是历代官府的主要税收之一，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调味品和营养品。“长芦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长芦是全国仅次于两淮两江的大海盐产区。”^[1]

清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1677），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使司（简称“运司”），分别移驻天津。天津成为长芦盐产销中心。



长芦盐区清代十场总图识（载雍正《长芦盐法志》卷二十“识图”）

长芦盐区大规模改煎为晒，长芦盐的产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明代长芦盐共有24场，后因合并、裁撤，至清雍正年有10场。其中在津境有5场：富国场、丰财场、芦台场、兴国场、严镇场（北半部）。芦台场之盐，色白、粒大、质坚、味厚，古有“芦台玉砂”之称，并承造长芦御用盐砖。

康熙十六年（1677），在天津河东建有长芦商坨，南起季家楼，北至掣盐厅，呈带状环绕

海河，盐坨分生熟两坨，有坨地240余条。

盐的专卖方式，由原来的官专卖时期，至官商的专卖时期，再到清代的商专卖时期。所谓盐商专卖，是由官府发给盐商“引票”（特许凭证），规定引地（销地）和引额（销额）。盐商按税率交纳税款后，再到盐场坨地按引额支盐，然后运往引地批卖和零售。“引票”又叫“龙票”，世袭相传。这种专卖方式被称作“引岸专商”制度。

清代，长芦盐的销地，包括直隶省（今河北省境内）131州县和河南省52州县。

清代芦盐的运道，以海河、运河之水运为主。到岸卸下船后，再行人搬、车拉、马驮等。

清代芦盐的发展，大运河运道的方便，造就了从清初至清末天津一批盐商。其中，张氏、查氏、金氏、安氏及其名园，还有其他12家盐商及名园和新老“八大家”中的7家盐商及名园，等等，形成了盐商名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如果说，北京以“大宅门”而著称，那么，天津以盐商名园而享誉。

这些盐商发家致富后，不只是花天酒地，而是建筑文化名园，招引大江南北文人墨客，如张霖家号称门客三千，查氏水西庄招南北名流170多人。他们诗词唱和，纵情笔墨，被称为“当年诗酒地”（崔旭《津门百咏》诗句）；其唱和盛况是“臂笺飞翠，殆无虚日”（查为仁《莲坡诗话》诗句），致使芦鹾文化洋洋大观，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盛况空前，开启了清代天津高雅文化的辉煌时期。

此外，当时天津很多事物的发展都与芦盐密切相关。诸如：城区建筑、改造皇船、建桥修路、修筑坨堤、筹饷赔款、治河救灾、资助实业、支持修志，等等。

大运河运出的芦盐繁荣，促进了天津卫城的升华。

[1] 刘洪升：《长芦盐法志》序言，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

“卫”，是一种军事监制，虽然天津三卫直隶于中央后军都督府统辖，但是其地方管辖权较小，限于天津城厢；出了南门、西门，属于静海地方，出了东门、北门，属于武清管辖；天津三卫设立的 143 个屯堡，也是在其他州县境内的“飞地”。

随着天津地位的提升，清雍正三年（1725），天津改卫为天津州；同年，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雍正九年（1731），升直隶州为天津府，另设天津县（下辖 315 个村庄，2946 丁）。天津府共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一州六县，方圆 126 平方公里。这不仅揭开了天津开始有地方行政建置的历史，而且是天津历史上行政管辖最大的时期。

八、近代天津漕运的飞跃

清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迫开埠，9 个国家在天津建立租界，是中国城市中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的基地和桥头堡。



横行海河的列强舰船（历史照片）

英、法租界等先后在紫竹林等海河岸边修筑了码头，以及相应的库、房等。它的港区及其海关、航政、港务权，均被外国人所控制。天津港口由封建性的内贸港，沦为殖民地性质的开放港；由传统的中国帆（漕）船运输为主，改为以大型轮船运输为主；天津由内河、内海

运输为主，变为海外运输为主。殖民主义者疯狂贩运鸦片，进行掠夺贸易。兴盛了几百年的直沽漕运枢纽港区，为紫竹林等码头所代替，这是天津港区的一次性质的变异，是天津漕运的重大飞跃。

近代，是天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西风东渐，许多事物在海河两岸演绎，至少有百件大事在天津开先河，诠释了“近代中国看天津”的独特风貌。1928 年 6 月，天津正式定为特别市；1930 年 6 月，改特别市为市。在天津城筑建不到六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全国特大城市，既是天津的幸运，又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九、结语

长达 1800 多年、近 1800 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流经天津等 6 个省市、几十座城市，沟通长江、黄河、海河等 5 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

天津现有 16 个区，其中 13 个区是运河流经地或与运河有关。特别是大运河的天津转运枢纽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城市发源地。大运河为主流的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

新中国成立后，河、港都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以后，海河经根治，再无水患，成为造福天津人民的城市生命线，成为津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天津河、海之利，加上蓟北雄关，形成了中国特大城市中独有的山、海、河壮丽景观。

明代曾棨《过直沽》诗云：“海河千派合，舟楫万方通。”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海河入海处的天津港，辐射五大洲，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海河，架起了天津与世界的友谊大桥，天津人民热情欢迎海外朋友，前来天津品尝海河的别样风味。

（作者为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回应时代需求 树立职业自信 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

——参加 2023 年第一期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
培训班的思考

夏秀丽

金秋十月，有幸参加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志办”）在浙江绍兴举办的 2023 年第一期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培训班分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所有参训人员统一参加首届中国数字方志论坛暨纪念章学诚诞辰 285 周年学术研讨会；第二环节为新任负责人培训。此次培训创新性地与首届数字方志论坛合在一起，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体现出地方志这一传统文化事业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大有可为的发展路径，使参训者强烈感受到地方志事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更加明确应自觉树立地方志职业自信，以更广博的胸怀回应时代需求，将积淀深厚的地方志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

一、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在经过“一轮”“二轮”志书编修工作后，在继承传统修志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的发展模式。随着修志实践的不断加深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方志这一古老而悠久的事业也迎来诸多机遇与挑战，

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一）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弘扬地方志文化已向纵深发展

10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此次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崔唯航在新任负责人培训班开班式的动员讲话中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纲，系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大力弘扬地方志文化。地方志作为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历史传统源远流长，饱含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强大基因。旧志成果占到中国古代典籍的十分之一，社会主义新方志经过“一轮”“二轮”修志工作，也有 9000 多部成果，再加上年鉴与地情书，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崔唯航指出，文物要“活”起来，古籍要用起来，而文化也要“火”起来。地方志文化要“火”起来，就要依托它与地域文化相依相从的特点，树立“修志为用”思想，改变“重修轻用”的一贯做法，注重地方志成

果转化，与当地城市文化培育紧密结合，以展览展示、场馆建设、成果开发等手段，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将地方志文化融入城市角落，融入百姓万家，使其更“接地气”，在“烟火气”中充分展示地方志文化直击心灵的魅力。

（二）地方志事业呈现出多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专业领域从开始的志书编修单一发展模式，到志书编修、年鉴编纂两驾马车带动发展，又到今天的志书编修、年鉴编纂、方志馆建设等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呈现出地方志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逐渐自成体系的特点。地方志理论研究也从志书编修理论、年鉴编纂理论，扩展到方志馆建设、志鉴成果开发、数字方志等领域。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地方志已经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发展为较为独立的学科。此次培训课程亦紧贴地方志事业发展现状，设置了志书、年鉴、方志馆建设等课程，涉及修志人才建设、修志组织管理、志书编修的知识与路径、精品年鉴质量把控、“三轮”修志前瞻思考以及方志馆建设的现状与发展等多方面，基本涵盖了目前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些专业课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既为培训人员“扫了盲”，也使培训人员从宏观上掌握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脉络和努力方向，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热情。

（三）利用新技术成为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巨大引擎

在数字方志论坛中，几位专家从数字人文知识结构、数字方志的内涵和外延、数字化技术对挖掘方志资源的便捷性等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分别对各自方志数字化建设经验与做法进

行了交流，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思路。如，浙江省正在开发的管志应用系统，包含修志应用系统、存志应用系统、读志用志应用系统；江苏省以丰富的地方志资源为基础，建成了汇聚6000本地方志、1500万条知识单元、60亿字数据的全省地方志数据资源中心；云南省集成了包含“数字化采集和加工系统”“志鉴协同编纂系统”“志鉴报送系统”在内的大量应用系统等等。这些省份将地方志编修、地方志资源开发、地方志文化传播融入当地“数字中国”建设，与国家正在开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战略、新技术紧密结合，做到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取得了领先于全国的发展态势，地方志事业由“偏门”“冷门”，变成了“热门”。使参训者感受到无论是从修志方法上还是实现路径上，均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应紧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同时提升编修效率和质量。

二、回应时代需求，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

地方志事业具有延续性、地域性，也有鲜明的时代性。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编修地方志既是为记录历史，也是为时代立传。可以说，时代的需求就是地方志工作发展的方向。要以开放的心态回应时代需求，不断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难题，促进地方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必须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培训中，每一位授课老师均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作为发展地方志事业的基本遵循。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首要的是要为政权服务。志书编修从古至今均是政府主持，志书历来被当作“官书”，发挥“资治”“教化”作用，天然地带有政治性。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肩负着“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同



样决定它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文化事业，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组成部分，必须要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还要紧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来做文章，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己任，将地方志事业融入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中，不断开拓思路，创新工作路径，推动事业发展。如，培训专家在讲到第三轮修志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指出要重视行业志、部门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等志书编修工作。目前，我市正在开展的市级未修志单位修志工作，既是大力推进部门（行业）志编修的业务工作，也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是用志书记录天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再现天津城市品格的重要路径。《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明确规定，要推动各区乡镇村志编修工作，亦是我市修志工作努力建立区县、乡镇街道、村三级志书编修体系，是志书编修工作向纵深推进，更好“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情”，激发人民“爱天津”“为天津”的重要实践。

（二）大力推进地方志数字化建设

2022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把文化数字化上升到国家战略，提出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的目标。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并将数字中国建设工作情况作为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参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数字中国呼啸而来，地方志数字化应运而生，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成为历史必然、大势所趋。我市地方志数字化建设

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一轮”“二轮”志书尚未全部进行数字化转换，“掌上年鉴”数据平台正在搭建试运行，地方志数字化建设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可借鉴先进地区经验，从规划入手，对接“数字天津”建设，建立全市地方志系统统一数字化平台，将市区两级地方志成果纳入该平台，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从而节省资金，实现共建共享。亦可与档案数字化建设相结合，建成档案、方志两种资源互相融合的创新型数据平台。

（三）加大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力度

在数字方志论坛上，各先进地区均特别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开发各类地方志文化产品，注重与各类媒体广泛合作，宣传地方志文化，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相统一的良好局面，达到了让地方志文化“热”起来的效果。如云南省实施“云南方志资源微视频开发利用工程”，建设云南省情和方志文化传播融媒体宣传矩阵，与央视、新华社、人民网、云南发布等官方媒体通力合作，播放云南省地方志办制作的微视频作品。同时，利用城市LED广告大屏、公交车身、城市宣传栏、楼宇广告牌等宣传“美丽云南”“走进云南”等地方志文化作品。在抖音、喜马拉雅、爱奇艺、腾讯、优酷等各大网络媒体上开通账号30个，与70多新媒体构建立体多元的方志文化传播平台，引起了广泛关注，刺激了多个大型新媒体平台与云南地方志事业共谋发展。相比而言，我市地方志文化资源挖掘一直不够系统、地方志文化宣传也较为薄弱，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相应规划，组织力量深挖地方志资源，持续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志”说天津，让老百姓多读多看“志”里天津，从而扩大地方志文化影响力。

（下转第23页）

关于天津市地方志资源数字化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柳 杨

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编修地方志作为我国独有的优良传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文化工程。随着地方志工作的不断开展及地方志成果的大量涌现，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应运而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地方志资源进行数字化整理，可以原样保留其内容，且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可以实现长期保存。数字化的地方志资源使用更为便捷，读者可以通过相应的展示平台直接查阅，还可以借助各种方式实现高效地查找、有效分析相关信息，大大减少查阅研究成本。

一、政策支撑助推数字化工作开展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2022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2022年5月26日，《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主要任务中明确，要加强全市地方志数据资源建设，制定全市地方志数据资源标准。以数字方志馆建设为带

动，加快推进志书、年鉴资料数字化，力争实现馆藏第一、二轮志书以及市级综合年鉴全文数字化。依托各级地方志网站，充实完善地情数据库，为人民群众提供地方志资料在线阅读、查阅利用等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展示天津地情。

从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规划、地方志工作条例，到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都对数字化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地方志作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可以说，利用先进的技术将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是信息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地方志工作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的的关键时期。作为锚定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第一个文化发展五年规划，《“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不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而且对科技赋能、数字驱动也做出了强调，提出建立健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及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重塑文化发展模式。地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不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方志文化也



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积极推动并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工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势在必行。

二、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情况分析

新中国首轮修志实践中，部分地区在出版纸质版书籍的同时，还随书附送光盘版，更有一些地区制作了影视频像志书，如《东阳市志》《浙江省名村志》《河南省志》《晋江市志》《黄陵县志》等，这是地方志资源开始数字化改变的先声。

（一）部分外省市数字化情况

全国最早启动信息化建设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是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1993年启动山东省省情数据库建设；1996年完成一期工程；1998年建立“山东省情网”并在互联网上开通运行，省情资料数据库也同时投入使用。随着编修工作的不断推进及编修成果的取得，截至2017年，山东省情网站共开展了七次升级改版；截至2019年，省市县三级志鉴文献入库219部，入库资料20亿字，是目前资料最齐全、受众面最广的地情资料网站之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逐步多样化，贵州省方志云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方志云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方志云，面向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它共包含8个子系统，其中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主要是贵州省方志云综合服务平台及黔方志云微信小程序。贵州省方志云综合服务平台下设数字方志馆、志慧地图、黔专题、志专题、方志动态、历史上的今天、黔志讲堂7个栏目，其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推动了利用难、管理难问题的解决，也逐步实现了对省市县三级地方志资源的整合。系统上线运行时，已完成655部志书、34卷《贵州年鉴》的数字化、碎片化加工和标引，实现了碎片化检索。同时，还加入

以地方志研究为核心的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报纸等资源，并融合地方志编纂过程中需要的各类知识资源。贵州省方志云，特别是其中的贵州省方志云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为推动天津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工作提供了参考借鉴。

（二）天津市数字化情况

近年来，天津市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多措并举，加快志书、年鉴数字化转换，提升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推进地情资料数字化建设，向社会各界提供数字查阅利用服务，提升群众查阅服务水平。一是不断推进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部分志鉴书籍的数字化（已数字化书籍119本：其中，市志83册，区志25册，年鉴11本），且已上传网站供广大读者阅读、查阅。二是顺应志鉴资料数字化发展要求，首次开发制作《天津年鉴（2020）》移动阅读手机版（掌上年鉴），活化利用年鉴内容，进一步发挥存史资政作用。截至目前，已连续三年开发掌上年鉴，并将各卷年鉴链接到天津政务网，充分发挥存史资政作用。三是顺应数字化形势，推进《天津史志》数字化与传统纸媒的融合出版，2021年、2022年已连续两年开发制作《天津史志》合订本文检索光盘，增强可读性，扩大服务受众面，更好发挥平台阵地作用。四是实现《天津史志》出版与“天津档案方志网”的同步上传，高效便捷提供查阅利用。

截至目前，天津市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虽然已完成部分志鉴数字化，但由于早期志鉴书籍在出版时未留有电子版，使得后期再联系相关部门或者出版机构时，因时间久远及存储方式和介质不一等问题无法找到或内容缺失，导致仍有约100册志鉴未进行数字化或未达到可数字化利用程度，需要经过扫描形成电子文件、添加目录等才能满足利用条件，再上传网站实现查阅利用。

根据统计情况，截至 2023 年 5 月，天津市、区两级 17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已有 16 家开展数字化工作。具体如下：

1. 数字化率情况

按照志书、年鉴和地情资料分类对 16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数字化率进行统计，志书综合数字化率为 46.32%，年鉴综合数字化率为 59.64%，地情资料综合数字化率为 44.67%。其中，有 4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三类综合数字化率均达到 100%，其他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三类综合数字化率介于 42.61%~93.33% 之间。

由此可以看出，全市距离实现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全覆盖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人员短缺。目前，许多地方志机构的数字化工作多是由地方志业务人员兼职从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鲜有时间和精力专门学习计算机技术、数字化业务。二是资金不足。数字化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专业团队，在人员短缺情况下，只能借助社会力量开展此项工作。而地方志工作机构作为非营利单位，只能通过申请年度专项经费获取资金支持，但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无法正常开展此项工作。

2. 数字化内容和公开利用情况

对 16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数字化内容和公开利用情况进行分析：（1）数字化内容：按照数字化内容是全文数字化还是部分内容数字化区分，有 11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全文数字化率达到 100%，有 1 家未开展全文数字化，其他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全文数字化率介于 71.43%~91.58% 之间。（2）公开利用情况：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有 6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实现全部公开利用，有 4 家进行了部分公开利用，其余 5 家未公开利用；在进行公开利用的单位中有 7 家实现了全文公开利用。

由此可以看出，还有部分地方志资源全文数字化仍未实现，数字化资源的利用也未达到

全部实现。主要存在以下原因：一是目前全国尚无正式颁布志鉴资源加工标准规范，志鉴数字化成果数据标准不统一，数字化后的资源无法实现多平台适应，影响深度开发和共享利用；二是受资金限制，相较于部分内容（大部分为书目）数字化，全文数字化的难度和成本更高，在资金短缺情况下，无法开展全文数字化工作，更无法满足对外查阅利用平台来展示数字化资源；三是数字化资源对外利用的意识仍需加强，相较于编撰和保存工作，数字化资源的利用工作未得到足够重视，即使已经做了数字化，也只是为了做好保管、留存工作。

三、针对存在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现有的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成果距离实现志鉴数字化的全覆盖，扩大地方志传播范围，普及地方志知识，为政务决策和学者研究提供系统全面的参考信息，推进地方志成果社会共知、资源共享等方面仍存在差距，远远不能满足地方志在为全局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上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撑。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增强数字化意识、数字化标准规范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财政专项资金保障等方面，笔者有以下思考，仅供广大地方志同仁参考。

（一）增强开展地方志资源数字化重要性的认识

各级地方志机构的负责人首先要增强地方志成果数字化的重要意识，深刻意识到开展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工作既是地方志信息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举措。地方志资源数字化使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们能够借助互联网快速查询和利用地方志成果，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便捷、经济、先进的查询手段，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更好地诠释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二) 加快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标准规范建设

数据库的使用标准不一致，数据信息的加工格式各异，导致不同网络平台之间无法兼容，难以实时共享信息，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鉴于此，天津市地方志工作机构正在积极推进《地方志数字化加工技术规范》的申报立项，努力为规范开展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工作提供技术遵循。

(三) 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大部分人员对地方志业务较为熟悉，但对数字化相关技术知之甚少，应从现有的人才队伍中选择学习能力强的人员，进行数字化方面的技术、能力、意识的培养，以弥补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另外，专业技术人员较少且年龄偏大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利用遴选、公开招聘等方式，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信息化专业人才，并通过“传帮带”的导师制方式向其传授地方志相关业务知识。

(四) 积极申请数字化专项经费

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做好实体书籍开放利用、数字化基础工作的同时，要主动作为，使地方志资源在经济建设、对外贸易、旅游开发和政府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同时，应把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建设提高到参与政府决策、振兴地方经济的高度，积极争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在年度工作规划中做好资金预算，对数字化工作单独立项申请专项资金，做好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工作，以求更好实现资政服务。

(五) 依托利用平台，实现同筹共建

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天津市档案馆与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合并，两网合并为“天津档案方志网”，体现了档案方志融合，地方志数字化资源可通过二级网页“天津方志网”进行查询利用。依托现代科技信息化手段，

通过天津档案方志网平台，把丰富的地方志内容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推送，为大众提供地方志产品多元化的选择，进一步拓宽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扩大开发利用的影响，巩固加深方志文化宣传效果。各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建设中要充分谋划数字化后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巧借“数字政府”建设东风，主动作为，服务大局，积极融入中心工作，实现地方志资源数字化保存，积极推动数字化资源的对外利用。

四、结语

新时代地方志工作要服务人民大众，必须做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方志文化的需求，更好的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绝不仅仅是做好编纂工作即可，更重要的是让地方志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人阅读、人人喜爱的文化载体。这一传播过程需要积极推动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让地方志成果在各种新技术的加持下，更好地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更好地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形成地方志修用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真正使地方志“贵在史识，重在致用”，让地方志“活起来”“飞入寻常百姓家”。

参考资料：

- [1] 金雄波：《以第三轮修志为契机加快地方志数字化步伐》，《新疆地方志》，2019年第4期。
- [2] 申小红：《对地方志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几点认识》，《新疆地方志》，2013年第4期。
- [3] 欧长生：《从方志微信公众号开发利用看志鉴数字化传播》，《福建史志》，2017年第4期。
- [4] 顾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研究》，《文化产业》，2023年第11期。
- [5] 沈松平、汪凤娟：《新中国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历史回顾、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4期。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馆)

浅谈志书的可读性、感染力

——以名镇志、名村志为例

赵 菁

地方志书是一种工具书，但一直以来可读性不强、利用率不高是阻碍地方志发展的一大因素，因此地方志在讴歌新时代、服务大局上存在一定短板。笔者从体例、立题、内容、装帧等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吸引力、感染力，让志书走出束之高阁的书架，为人民服务、为现实服务，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使传统志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着力在体例上守正创新，彰显“名”与“特”

地方志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容系统全面、包罗万象，涵盖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体量过大、阅读不方便，文字内容多、图片内容少，宏观资料多、微观资料少，平面内容多、典型内容少等诸多问题。编纂新时代志书要力求体例上突破和创新，突出地域特色、时代特征、专业特色，而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名镇、名村志都会在篇目上动“大手术”，突出当地特色亮点、区域建设、姓氏望族、民风民俗以及名人效应等。因此，在设计篇目时，采取升格处理或重要内容前置的方式，力求守正创新、简约新颖，彰显浓厚的地域特色。同时，增添方志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如区域位置、建置沿革、地理优

势、基本镇情村情、村务管理、村民生活、艺文杂记、大事纪略等，按照类目、分目、条目的体例分别加以记述。同时，在卷首设大事纪略，进一步彰显历史上曾发生的大事。全书以志文与图照为主，注重收录具有存史价值的特色图片，做到图文并茂，增强可读性。这样编纂出的名镇名村志，不仅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且便于读者阅读。

二、注重立题有新意，增强吸引力

在类目、分目、条目立题上立足有新意，简练而醒目。坚持秉笔直书，同时更加强调其文风优美、朴实，作为传统志书的补充、提炼、升华，名镇志、名村志是传统志书的全面升级版，而非缩编版。例如，编纂名镇名村志的人物时，关于名人，在立题上不是简单地罗列出名字，而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物的本质特点。在记述名人时，要着力挖掘该名人与本区域的内在联系，如在某领域内有什么创举，又或是在本区域、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做出突出成绩，具有其专业特色等等。

三、把握好随文附，增强感染力

志书的附录部分绝不能当作附带之物，可有可无。在编写这部分内容时，要仔细筛选，认真对待，不可随意选择，敷衍了事。随文附在志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



说，随文附的功用主要有五点：一是展现全貌；二是丰富史实；三是补充佐证；四是深化纪事；五是拾遗补缺。

运用好随文附至关重要，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尤其要注意抓住深化、佐证、补充三方面的特征。随文附形式活泼，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应抓住典型和重要特征，把与正文有关而又能辅助和印证正文的记述事物最主要、最突出的资料加以收录，既不能以偏概全，又不能挂一漏万。要分清主次，抓住事物的本质，使“附录”真正达到“附”的要求，前后照应。例如，名镇、名村志中特色旅游景点，在正文记述后选录诗文佳作作为随文附，形象生动地展现秀美的风光、迷人的景致，更好地印证了前文对其特色景点的记述；或是增加专门介绍其景点的村记、赋以及历史遗迹的碑记，进一步丰富史实、深化纪事。再如，记述“村民生活”类目时，除了展现村民衣、食、住、行等方面面的内容外，增加村民致富带头人的相关随文附，更好地拾遗补缺，强调了“领头雁”在村庄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进一步补充佐证，印证了村庄美、村民富、经济强的幸福画卷。

四、挖掘史实内容，增强可读性

关于志书体例的创新，除了使用志文后的大附录、正文后的随文附等惯用体裁外，还有关于地域特色的专记。增加“专记”部分，是新时代志书体例上的一个创新。例如，名镇、名村志中增加对当地地域特色方面史料的挖掘，并确定以大事纪略的记述方式展现出来，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影响深远的活动、当地的文化品牌、特色荣誉等。再如，名镇、名村志中增加关于对特殊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当地形成的特殊地貌、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贤及望族、特色镇村保护及实施的相关记述，

以专记的形式加以补记，既彰显了当地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又增强了志书的历史厚重感。

五、丰富收集资料方式，增强存史价值

除了编纂志书时必须收集的文字资料（档案资料、文献资料、报纸杂志、统计资料）外，名镇、名村志还注重对微观资料的收集，并且采取实地调研走访、座谈会、个别访谈、撰写回忆录等方式收集一手资料。同时，对收集到的资料要认真筛选，注意甄别，反复核对史实，方可入志。如深入田间地头、山川河流、公路桥梁、道观寺庙、大院民宅，重大事件发生地等实地勘察，并进行乡野调查，对测绘地图、数据、实景照片等进行汇总；收集遗址遗迹、凭证票据、奖杯奖状、工具物件等实物资料；采集图像、媒体公众号、“两微一端”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料；走访知情人，获得“活”的资料，即“口碑资料”。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的资料，如家谱族谱、村规民约、古碑文、日记、信件、诗词楹联、个人著述及手稿、家庭收入与重要支出等等，形象直观，富有历史文化信息和时代印记，入志记述往往更能说明事物发展变化，从而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存史价值。

六、注重装帧设计，增强外观美感

志书的装帧设计是影响一部志书整体形象的关键一环。编纂者要注重从封面封底设计、图照位置的摆放、排版样式、设计 logo、装帧包装等方面下功夫，这样编纂出的志书有利于扩大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力，达到宣传、推介、育人的效能。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推出的中国名镇志、名村志文化工程，不仅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引发强烈反响，在编纂内容上更好地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化，真实记录基层社会变迁，并且在志书的装帧设计方面也有不少亮点和创新。例如，志书在图照的选择上力求贴近生活、贴近民情、贴近百姓，反映重

大变化或重大成绩，注重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或是重要节点、重要活动，做到客观、真实，同时又具有全面性、准确性、连贯性、系统性。文前彩页既有行政区划图、交通示意图，又有航拍远景图，全面展现区域的整体面貌。名镇志、名村志系列丛书封面统一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的照片，既大气美观又彰显地域特色；封底有简要介绍其区域的文字作陪衬，既不空洞又不乏味。书脊处统一的“名镇”“名村”logo装帧设计，使系列丛书显得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可见，整体的装帧设计对一部志书至关重要。装帧设计做到大气美观、独具特色，可大大提升整部志书的可读性、感染力和吸引力。

总之，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彰显志书的可读性、感染力是一部精品佳志的重中之重。提

高志书的可读性，应当选材得当，体例科学完备，内容全面丰富，立题新颖，突出特色，注重装帧设计，使全志具有真实性、科学性、简洁性。同时，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全面提高志书质量，整体提升志书品位与层次，使编纂出的志书真实准确，同时又兼具可读性和感染力，从而大大提高地方志书的社会影响力，彰显志书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参考资料：

- [1]霍贵兴：《志在精品——天津市北辰区二轮修志编修纪实》，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 [2]周永光：《如何提高地方志的“可读性”》，《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4期。
- [3]陈蓓：《度的坚守与突破——试论如何提高地方志可读性》，《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北辰区档案馆)

(上接第16页)

(四) 着力实现地方志人才可持续发展

崔唯航在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是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培养一支信仰坚定、境界高远、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领头雁”队伍，是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对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提出了“五个尽快”的要求：一是尽快完成角色转换；二是尽快了解地方志事业发展趋势；三是尽快熟悉本地区地方志工作情况；四是尽快把握地方志工作规律；五是尽快厘清地方志工作思路。我们也要看到，新时期地方志事业发展需要的是大量复合型人才，除“五个尽快”的要求外，还要具备以下几点：一要具备鲜明的政治立场；二要了解和熟悉地情与历史；三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与多方面知识；四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面对时代要

求，地方志事业发展还需要大量掌握新技术、熟悉新媒体运作、擅长资源开发等多方面人才。目前，我市地方志人才存在“青黄不接”“人才断层”、缺少专家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多角度多路径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保持地方志机构人员相对稳定、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借助外力扩大合作等几个角度破局，逐步提升地方志人才质量，保障地方志人才可持续发展。对地方志工作机构从业者来说，应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看待地方志事业，切实树立地方志职业自信，练好“内功”与“外功”，时刻做到“志存高远，力学笃行”“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从而“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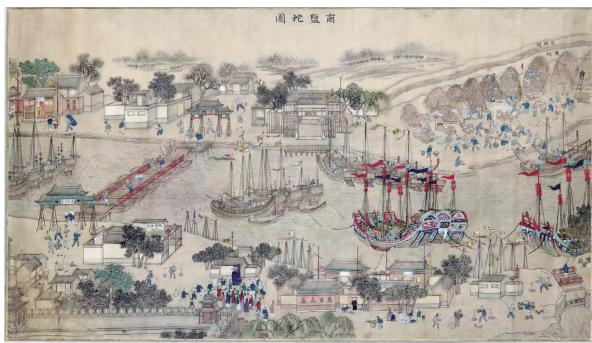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新发现的天津《商盐坨图》

高 伟

最近，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利民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幅描绘天津海河盐坨的风情画《商盐坨图》，得知消息后，天津博物馆研究员陈克先生第一时间复制了这幅《商盐坨图》并传给我们，希望我们认真研读此图。据燕京图书馆信息，这幅图画发表于清光绪元年（1875），画长79厘米，高41厘米，从画的内容来看，好像是一本教科书，详细地介绍盐坨地商盐的制作过程以及盐役们在盐商的监督下辛苦劳作，生动地诠释了生、熟盐转换及发运流程，估计是长芦盐商委托民间画师的杰作，想来主要是扩大盐坨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宣扬盐商们的业绩。这幅画没有标注作者的信息，姑且佚名。



新发现的天津《商盐坨图》

天津乃退海之地，有着一百多公里的海岸

线，自古就是一个出盐的地方。早在后唐同光三年（925），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就在渤海之滨设立了“芦台场”煮盐，元代又在三汊沽发现了煮盐的卤水，开启了三岔河口的繁荣。据王鄂《三汊沽创立盐场碑记》载：“甲午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之秋，三汊沽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时人指以为瑞，遂相率诉于官，按验得实，受旨煎造，初得旧日高松、谢实十有八人，岁不再易。”蒙古太宗六年，三汊沽发现盐卤涌出，朝廷核准高松、谢实等十八人在此煎盐。两年后，又在此处设立“三汊沽司”“大直沽司”等管理盐业，后来，又连续开启了三汊沽、富国、厚财、兴国、丰财等6处盐场。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设北平河间盐运使司，对制盐、贩盐进行集中管理。永乐初年，改称长芦都转运使司，从而确立了“长芦盐”的品牌。长芦都转运使司下辖沧州、青州分司，天津设卫以后，青州分司由长芦迁至天津卫，在天津卫城东门外的海河边建起了衙署，管理天津境内的几座盐场。清康熙以后，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到天津，在天津设立衙署。此举大大促进了天津盐业的发展，使天津很快成为长芦盐的产销储中心。

天津卫的早期繁荣依赖漕运，是粮商的兴

起奠定了天津早期的繁荣。清以来，盐商阶层的快速崛起，促进了天津的商业、经济、文化全面高速发展。盐坨的兴盛就从这个时期开始。清康熙七年（1668），长芦巡盐御史署从北京迁到天津，在南运河畔原明饷道衙门设立“巡按长芦盐课查院”衙门，据清嘉庆十年（1805）重修《长芦盐法志》卷二十载：“巡盐御史署，在天津三岔口西北岸。初，长芦巡盐御史署在京师。御史每岁一巡直隶、河南、山东盐。天津向葺户部饷司衙门为御史巡舍。康熙七年（1668）御史孟戈尔代疏请移驻天津。”另据清盛康《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五盐课四》载：“康熙七年。御史孟戈尔代。巡视芦盐。以远驻京城。鞭长莫及。始请即行馆为衙署。改驻天津。芦盐向设批验二所。北所在天津之小直沽。南所在沧州。自盐场裁并以后。北所掣盐十之七。南所掣盐十之三。运司等官。亦以天津掣盐为便。皆改驻焉。”康熙十六年（1677），长芦盐运使司官署也迁至天津，在天津东门里赁民房设立公署。《新修长芦盐法志》卷五之“公署”记载：“长芦盐运使司衙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熏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衙署。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告运居北者众，督催引课道远非便，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长芦巡盐御史署和长芦盐运使司衙署齐聚津门，首要任务就是设立盐关和储盐的盐坨地，在卫城东门外海河东岸设立盐关厅（掣盐厅），把海河东岸的原明銮仪卫庭燎厂钱粮苇地租下，设立储盐的盐坨地。从此，天津盐商们储存盐引一律存到盐坨地。天津的盐坨地从东浮桥直到季家楼一带。有石碑把盐坨

地一分为二，碑南至季家楼，谓之旧坨，以贮生盐；碑北至盐关厅，谓之新坨，只贮熟盐。按大清律制，官盐不可私贮。各盐商从盐场收购的生盐必须先在旧坨存放，经掣盐厅盐役称掣后变成“熟盐”才能进入新坨存放。何谓“熟盐”，就是经盐役把盐场生产存坨的散盐及各种包装的生盐统一用“芦席”重新称重包装的盐包。据《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八载：“各商由场运盐未入砣之先，谓之‘生盐’，入砣之后，商人引领改包，谓之‘熟盐’。其配筑提运，均于砣地行之。”用“芦席”重新包装的长芦盐，重量、外形尺寸都是统一的，盐包的开口处要由编席者编上，外缠苇索捆扎，不撒不漏，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装船外运和储存封砣都很方便。那盐坨从掣盐厅浩浩荡荡一直排列到季家楼一带，盐垛连绵，如长龙一般，在海河沿岸树立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季家楼老龙头渡口名称即由此而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使团的主计员巴罗就曾为海河东岸如山的盐坨惊呼。许多文人对长龙一般的盐坨地都做过描述，如张焘的《津门杂记》记载，天津河东盐坨“盐包累累如山，呼曰盐码，地占数里，一望无际”。清唐尊恒也有诗云：“河东几甲号盐坨，堆积官盐近更多。赢得纲商佳子弟，花天月地会消磨。”《津门百咏》中则描绘这些盐坨：“堆积如山傍海河，河东数里尽盐坨。”

这幅新发现的《商盐坨图》作者细致描绘了盐坨地的盐役们制作熟盐的全过程，用连环画的手法把各道工序如编织席包，装盐杵实，苇索打包，上跳装船等过程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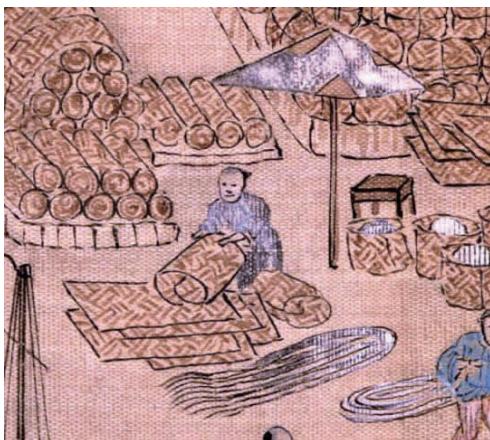


得淋漓尽致，生动翔实，人人看得明白。

1.拆坨卸盐：盐坨地一年有两次开坨，秋坨是收进各盐商从盐场购进的生盐，春坨则把转换为熟盐的盐引装船发往引地。《商盐坨图》描绘的正是开春坨，盐役们正把往年秋季收进的生盐从盐坨上卸下，供制作熟盐使用。



2.编织席包：设专人把从苇席产地（胜芳）运来的席片卷成圆筒状，编上筒底，为装盐打好基础。



3.装盐杵实：将拆坨卸下的生盐装入盐包，一层层用盐杵将盐杵实，装满后用盐锤砸成结实的整块，然后称重计量。盐包的重量是朝廷统一规定的，加上席包和捆扎的苇索，毛

重不能超过三百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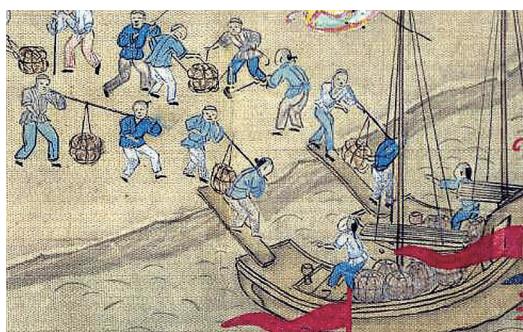
4.盐锤砸实：苇索缠绕，盐锤砸实，浑然一体，不撒不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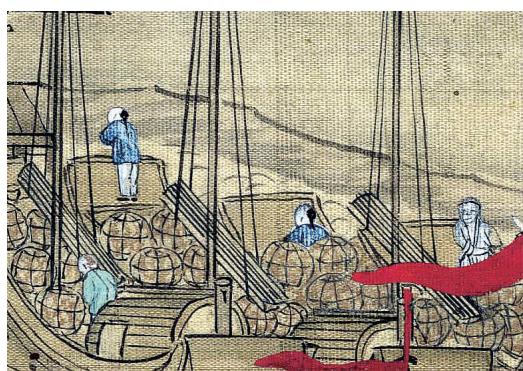
5.计量称重：一包长芦盐即一引，明代一引为六百斤，清顺治年后“一引改三”，规定一引加包索毛重二百五十斤，后来盐商们普遍反映运输途中亏分量，盐商无钱可赚。朝廷又补增五十斤无税盐，改为三百斤。有的商人改包加盐至四百斤。更有甚者，买通司秤官吏，加重秤砣的重量，逃避复秤误差，企图过关。一经查出，轻者坐牢，重者掉脑袋。因此，守法的盐商严格称重，不敢超过三百斤。



6.上跳装船：把称重后的盐包用苇索捆扎成圆形，不撒不漏，重量一致，外形基本统一，便于装船和码垛。三百斤重量不是一人可扛的，必须二人抬上跳装船。装好盐包的盐船便可以接受盐关的查验驶往引地。



7.装船外运：装好盐包即将外运的盐船，正在接受盐关厅官员的查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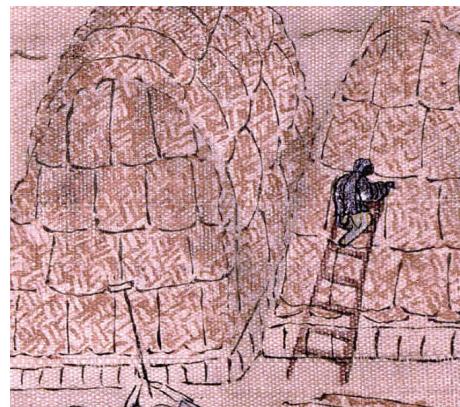


8.盐役们这些程式化的工作，就是把运进盐坨的生盐转换成熟盐的全部流程。秋季入

坨的海盐无论散装还是盐包，一律谓之生盐，在春季出坨前必须在盐商的监督下“引领改包”，最新打包称重上跳发运。整个工作过程都在盐商的监督下完成。图中的盐商头戴草帽，身穿长衫，站立于改包现场，监督盐役们的工作。



9.码垛苫缝：重新打包的“熟盐”除上船发运外，其余的则进坨重新堆藏。盐包九引为一堆，每堆谓之一码，数十码为一垛，数十垛组成坨，盐包排列成行“累累如山”，占地数里“一望无际”，蔚为壮观。码成盐坨的盐包外面要用芦席苫盖，自下而上地把芦席一层层缝在盐包外面，坨顶做成坡状，风雨打在芦席上会沿芦席淌下，不会内渗，盐包在狂风暴雨中可保安全无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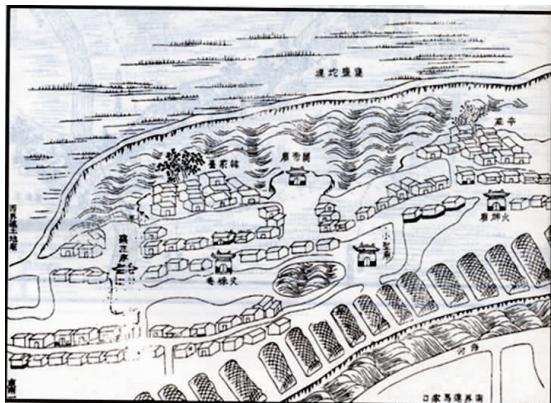
10.盐地繁忙，有条不紊：天津海河东岸盐坨地，每到春季开坨时，严格按盐引数量课



税出坨，杜绝私盐流出，盐关浮桥也成为天津长芦盐业的重要关禁。最近在网上披露的“海宁盐官陈家”，其祖上就有一支在天津经营管盐坨，被家族称为“北盐陈”。据《长芦盐法志》记载，早在清康熙元年（1662），清廷就曾责令“青州分司”催收东门外盐坨地所欠的地租和白盐场的地租。说明在长芦盐运司迁到天津之前，海河东岸的盐坨地已经开发了。从图上看，盐役们工作辛苦，有条不紊，盐商监督，严格把关。盐坨边上还有卖小吃水果的商贩，期待和盐役们做生意。一道护坨堤如一条长龙护佑着盐坨免受水浸伤害，这是雍正二年出任巡盐御史的莽鹄立主持修建的。盐坨地本是一片低洼苇地，极易被水浸腌渍，莽鹄立采集众议，修建了这条护坨堤，保护盐坨，功不可没。



11.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中盐坨及护坨堤的插图。



这幅《商盐坨图》的发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长芦盐和盐商们对天津近代发展做出的贡献。入清以后，盐业、漕运、河道成为清朝经济的三大支柱，盐业和漕运在天津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实行引岸世袭制后，至清代，盐商的财富急剧暴发，迅速成为城市巨富群体。据清道光二十六年《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天津县共有大小盐商401户。其中天津富豪“八大家”中半数为盐商，尤其是有文化底蕴的盐商们更是成为天津经济、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领军人物。他们招揽名士，赞助文化和慈善事业，引领了天津的文化走向。凭借盐商们雄厚的财力，在居住的海河边、运河边建造了大批的私家园林建筑。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张霖，在天津金钟河畔修建了私家园林问津园，“延纳四方名俊”，成为沽上园林之最。几十年后，在张家当盐伙的查日乾又成为天津盐商的领军人物，在南运河畔修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开启了城西的社会繁荣。还有安氏的沽水草堂、梁洪的七十二沽草堂、龙震的老夫村、佟宏的艳雪楼、童氏的枣香村、金氏的杞园等。盐商群体的崛起为天津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文人名士雅聚的示范效应和盐商们儒雅的行为作风，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崭新的道德规范，识字的人多了，文明讲礼的人多了。如海河东岸的盐坨地，历代居住的都是贫穷的盐役和脚夫，没有识字之人。盐商起家的乾隆举人杨一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己掏钱在盐坨地开办了一座“凤楼书社”，专门招收盐夫子弟和贫穷无着的人来书社读书。他用自己的满腔热情培养盐坨子弟，终于使盐坨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只会喊“盐坨号子”

的年轻人，也可以“舞文弄墨”了，为盐坨一带的文化兴盛，功不可没。《天津县新志》曾赞曰：“盐坨滨河朴陋，其人民逐末食力，不习诗书，一昆假馆其地十年，门徒日盛，遂使弦歌比户，由野而文，人谓一昆为盐坨开山之人焉。”这种评价，不仅是送给杨一昆的，也是对整个盐商群体的肯定。大批的江南文人精英长期寓居在这些私家园林中，吟诗唱和，创作出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一段历史内，影响和改变着社会风气，引领着天津的文化，左右着天津的艺术时尚。

盐商们在清康熙年间就成立了芦纲公所。芦纲公所在天津兴办了一系列文化及慈善事业，在诸如育婴、恤嫠、济贫、免费施种牛痘、施粥、水会、义冢等常规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盐商们对天津的现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厥功至伟者应该是盐商世家的严修和张伯苓。光绪三十年（1904），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中国近代教育先驱严修、张伯苓，以学馆为基地，在天津改革旧式教育，推进新学，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形成了南开系列学校，构建起中国第一套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显示，这幅《商盐塔图》“发表于1875年”，即光绪元年，然这绝不是该画成画的时间。画面上屹立在“天津分公司”旁的“海关”公署，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时间坐标。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的炮舰攻克了天津大沽口，直逼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了“三口通商”，天津被辟为“三口通商”的口岸之一。第二年，清政府被迫在天津盐关浮桥西头天津分公司旁设立津海关，开启了由外国人控制天津海关的历史。当时海关最高的负责人是税务司，按条约规定这个职务由外国人担任，隶属于全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人员的变动、升迁、职务都不受清政府的调遣，成为外国人的一统天下。同治八年（1869），海关由盐关浮桥旧址迁至新盖的英、法租界交界处的紫竹林海关大楼，也就是现在和平区营口道2号。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曾为新海关扩建题写了匾额“津海新关”，现保留在天津海关博物馆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幅《商盐塔图》最迟也应该在海关搬迁之前（1869年）画的。因为1869年以后，海关已经不在此处了。

《商盐塔图》是中国的文化资源，现仍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据悉，还有许多未被发现的中国文化资源隐藏在海外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者手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去挖掘、去发现、去研究，最终促使其早日回归中国。

（作者单位：民建天津市委委员会）

龙亭拜牌在天津

吉朋辉

万寿龙亭位于老城里只家胡同以东，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与皇帝有着某种关联。在古代，叩拜是臣子们表达对皇帝崇敬与臣服的最重要礼节，即便山水阻隔，此礼也不能免除，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日子，臣子们更需要聚集在一起隔空叩拜。这就需要一个合适的场所，万寿龙亭就承担了这个功能。

一、从涌泉寺到万寿龙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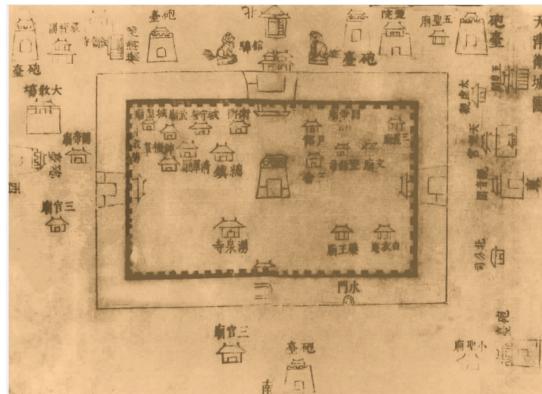
天津官员遥拜皇帝，最初并不在万寿龙亭。清康熙《天津卫志》记载，明代天津卫城内有涌泉寺，官员们“习仪于此”。所谓“习仪”，就是对朝会礼仪的集体预演，以防止官员因不熟稔而出现失仪，破坏典礼的整肃有序。习仪时，官员按照文武班次排列，向虚设的皇帝御座如仪叩拜。明代特别重视习仪，每当万寿节（皇帝生日）及元旦（大年初一）、冬至等重要节令前夕，两京及地方官员都要预先习仪，以备参加朝会。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没有参加朝会的资格，习仪更像是一种惯例性的仪式。

涌泉寺为明初天津僧人悟省所创，位于卫城南门里，最初仅有房舍十余间，狭仄简陋，官员

们习仪于此，规矩礼节多不能达到标准，甚至由于空间不足，有的人只能在舟中叩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弘治年间天津的首任兵备道刘福重修涌泉寺，利用其他三座废弃寺庙的建材，增建一座前殿、一座正殿、一座伽蓝殿，此后习仪之时，“陛墀高广，宫宇靓深，仪卫具陈，冠裳就列”，仪规排场都能合乎规格，凡准备入觐的官员都能够参与其中，而不像以前那样因陋就简。

到了清代，习仪发展为“拜牌”。根据《大清会典》，三大节即万寿节、元旦、冬至时，各省应“于公所恭设万寿龙亭于正中，南向，设香案于亭南”，官员分班叩拜龙亭中所设皇帝牌位，此即为“拜牌”。在清代，一般县以上城市都专门建设万寿龙亭，民间称之为“万寿亭”“龙亭圣庙”或“万寿宫”。官方文献一般将之称为“万寿宫”，以示尊崇。光绪三年（1877）长芦盐运使如山在《重修天津府龙亭碑记》里说：“天下行省分布散远，守土之吏不得时诣京师，而朝正祝嘏之典至重，于是皆有万寿宫之设，下至一郡一邑，亦得率属择地将事焉。”据乾隆年间《天津县志》记载，天津万寿龙亭有大殿三间、外宫门三间、朝房十六间、影壁一座，周围墙垣六十丈。所以，龙亭并不是一座亭子，而是一组颇具规模的宫殿建筑，“万寿宫”这个名称更符合其形制。

天津万寿龙亭创建于雍正八年（1730），由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奏建。此时正值盐商安岐重修天津城墙期间，而城工也是由郑禅宝监修的，修建龙亭可以说是一个配套工程，其作用是“岁时朝贺行礼并祝万寿及宣讲《圣谕广训》”之所。万寿龙亭建成后，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光绪三年（1877）两次重修，主持者



康熙《天津卫志》中的天津卫城图，涌泉寺在南门附近

都是盐务官员，资金来自天津官员及绅商的捐助。光绪三年重修时，李鸿章捐银二百两、石灰二十四万斤，长芦盐运使如山捐银四百两。捐银的主体是长芦盐商，比如杨俊元捐银五百两，严克宽捐银六百两，张锦文的儿子张汝霖捐银四百两。捐银最多的是长芦盐商许受之，金额为一千两。

二、龙亭拜牌的那些事

清代天津官员中，经常赴京参加朝会的是长芦盐政等钦差，而其他官员都在万寿龙亭中遥叩，这也是全国各地大部分官员的做法，且这种做法被皇帝所鼓励。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1770年10月1日）是乾隆帝的六旬万寿，长芦盐政西宁在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就启程赴京伺候差使，随班叩祝。但是当年四月份的时候，乾隆帝已经下旨给各地督抚，让他们到时候“率领官吏绅士，于万寿宫照常行礼庆祝”就可以了，不必进京，也不必再搞建坛演戏之类的活动。嘉庆二十四年（1819）嘉庆帝六旬万寿的时候，署理长芦盐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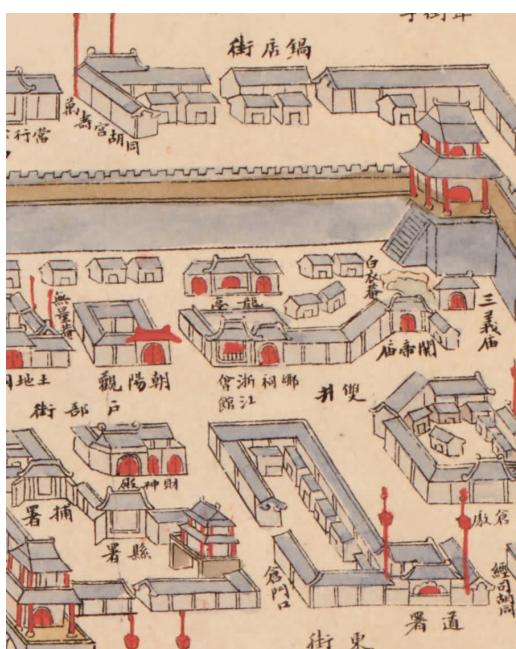
的陈文骏也上奏折请求去北京叩祝，但嘉庆帝让他“不必来”，于是他上奏折告诉嘉庆帝，自己会“届期恭诣本城万寿宫，望阙叩头，敬申嵩祝”。道光九年（1829），针对长芦盐政进京叩祝万寿一事，道光帝下令，以后“该盐政永不必奏请”。此后，长芦盐政们就只能在天津万寿龙亭里“敬申嵩祝”了。

天津在咸丰十年（1860）开埠，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吹进了近代化的新风气，龙亭拜牌这样繁琐的仪式，与近代化的轮船、电报等共同存在着，显得十分陈腐僵化。

进入20世纪后，万寿龙亭的拜牌仪式仍然在被一丝不苟地执行着，由已经移驻天津的直隶总督主持。根据当时报纸的记载，每到三大节之前，直隶总督都会发布告示，要求所有文武官员至期“恭诣万寿宫行庆贺礼”，有时告示中还会特意强调官员们要“穿朝服补褂，挂珠”，可见仪式的郑重其事。从海外归国的官员，经天津回京时，也都要先到万寿龙亭向皇帝请安。光绪二十九年（1903），驻法国公使裕庚携家眷归国，于一月二十九日（2月26日）乘船到达天津，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陪同下，到万寿龙亭行礼。裕庚的女儿裕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余父乃著礼服、朝珠、花翎、珊瑚顶，往万寿宫行礼。万寿宫已有官员等候，中间设一案，立太后、皇帝牌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袁世凯及其他官员先到，袁世凯立于案左，其他官员分两行侍立。余父到时，跪于案前，说‘阿哈请圣安’，说毕起立，问圣躬安康，袁世凯答云‘皆好’。此礼遂毕。”

1912年清朝覆灭后，万寿龙亭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曾经一度作为《天津售品所半月刊》社址和水灾灾民安置点，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被随意拆毁。所以，龙亭便逐渐倾颓，只能在地名里看到它的印记了。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



1899年冯启黄绘《天津城厢保甲全图》中的天津城东北角，可见龙亭（该图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天津牙粉牙膏行业的创业与发展历程

郭 枫 李重生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牙粉牙膏产业基地，有生产牙粉近 100 年、生产牙膏 80 余年的历史。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同昌行”进津创业，到天津牙粉牙膏行业合营后的长足发展，谱写了行业发展的辉煌。追溯其发展历史，记载较早且较为详尽的有李泽民和杨师琏收集整理并撰写的回忆文章。李泽民于 1943 年在天津创办“民生牙粉厂”，是天津牙粉牙膏行业从个体到联营合营发展的组织者，也是天津牙膏厂创始人之一。1951—1966 年，天津牙粉牙膏行业体制几经重组变革。

一、津门牙粉业昉始“同昌行”

刘凯平，系辽宁省锦州义县人，1911 年在沈阳市中街贾家胡同创办“同昌行”。为抵制日本牙粉，在北方首创“地球牌”牙粉，比日本货便宜一半，受到国民欢迎，后新增“老火车牌”超等牙粉，把薄荷脑、玫瑰等天然植物加入其中，形成清香的口味，产品分大小袋装和铁盒装，印有“国货首创”字样，品牌和商标图案寓意民族工业发展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产品畅销市场，主要销售给百货店和军队。该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在弟兄 5 人中刘凯平行大，其三弟刘自新、四弟刘兴治、五弟刘日新均参加生产经营。1919 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罢课、罢市、抵制摧毁日货，国产牙粉销售量大增。同昌行职工逐步发展到 30 多人，年利润逐年上升。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刘凯平不仅实业报国，抵制日本货，还加入东北国民义

勇军，1932 年 2 月被捕，6 月牺牲，年仅 42 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同昌行即由其 3 个弟弟等人经营，在天津河北区建国道致安里设 3 间厂房，在天津首次生产经营“老火车牌”超等牙粉，转年迁到河北区平安街，有职工 10 余人。



天津同昌行“老火车牌”超等纸盒牙粉

1937 年天津沦陷，刘氏兄弟去西安开办同昌行分行，“西安事变”后，又到成都等地办分行，仍生产老火车牌牙粉。由于爱国主义深入人心，国产牙粉销路逐渐增加，老火车牌牙粉除袋装外，又增加铁盒装。到 1939 年，职工人数增加，牙粉名气越来越大，十分畅销，有些投机商也以老火车牌牙粉作为投机倒把的筹码货。



天津同昌行“老火车牌”超等铁盒牙粉



天津民生牙粉厂
“白鹅牌”瓶装牙粉

1943年，河北省乐亭县朱各庄村的李泽民在东北学习牙粉制作后，到天津创建“民生牙粉厂”，生产瓶装的“白鹅牌”牙粉，物美价廉，凉甘爽口，在市场上畅销，因系家庭手工业，自

产自销，规模不大。当时，天津市场销售的国产牙粉主要有：天津同昌行的老火车、民生厂的白鹅；上海广生行的双妹、家庭工业社的无敌、永和实业公司的嫦娥、先施公司的先施；沈阳广生行的白塔、风船、钻石；哈尔滨广生行的银星、银娥等。

日本入侵以后，进口牙粉大量充斥市场，计有：美国的花旗，日本的苦林、粉小燕、斯毛克、狮子等品牌。其中，日本小林销洋行在中国设厂，生产狮子牌牙粉，由日本直接运来原材料，成本和售价低，加之大肆宣传，初创牌子时，在马路上白送，卖货可后收款，致使国产牙粉销售受到影响。老火车牌牙粉与之抗衡，因是国货，历史悠久，在“五四”和抵制日货运动中，该牙粉深入人心，产品仍然畅销。

1945年日本投降后，民生厂的白鹅牌牙粉销售量略增。天津又有正孚工业社生产的“飞舟牌”（又称“非洲牌”）瓶装牙粉，原做“面母”，后改做牙粉，采取专人推销提成的办法，销售量较大。

1946年，天津又有克瑞多实业社，后改名瑞华实业社，生产的“口洁素牌”牙粉，小圆铁盒装，泡沫大，携带方便，广告宣传称为南

洋产品，一时销路不小。

当时劳苦大众生活尚无保障，对刷牙习惯难以讲求。生活优裕的人多用进口牙粉，以日本货居多。国产牙粉因而销路不畅，只能以销定产。各百货店经销牙粉大多售卖完后才能付款，因此资金周转有一定的困难。在内压外挤压下，国产牙粉仅能维持小型生产，无力实现大规模发展。



天津正孚工业社
“飞舟牌”牙粉



天津克瑞多实业社“口洁素牌”牙粉

二、面临困境，发展举步维艰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入侵和内战，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生产牙粉的企业面临困境。

在原材料来源上，所用主要原料、辅料及包装用纸依靠国外进口，初期有石膏粉和清美太盐，即碳酸镁等。1923年，开始由日本进口碳酸钙，其他辅料也是国外进口，如日本的薄荷脑，美国的孟山都糖精、冬青油，荷兰的人造麝香，德国的冰片，法国的丁香油等。包装用的内袋硫酸纸和外袋道林纸也由日本进口，包装袋所用的糨糊是加拿大进口的面粉。生产国产牙膏所用的原料和包装用纸基本依靠进口。



如老火车牌初做牙膏所用的甘油，先是用龙须菜代替，后因质量太差，不得不改用进口甘油。

早期牙粉配方表

原料名称	百分比/%
肥皂(粉状)	5.0
天然碳酸钙(粉状)	93.5
糖精钠	0.2
薄荷油	0.4
肉桂油	0.4
冬青油	0.5

在经销和资金渠道上，产品主要依靠各百货商店代销和洋货批发庄经销。为数不多、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可派专人到东北、西北、华北等地推销。多数企业是小户小厂的家庭工业，人手不足时还需雇用少数临时工，生产量不大，资金不足，多属以销定产，只能自己找门路，或以优厚回扣的办法委托本市的百货店和洋货庄代销，大都是卖完货方能付款。资金困难时向钱庄、银号以高利息贷款，有时还贷不到款，因而经常资金周转不灵。产品卖少了不够开支，卖多了又无足够的原材料，处于艰难的维持状态。

在购买原材料上，小企业不能按批发价购买，批发与零售价格相差百分之十以上。即便有了销量，主要的香料只能临时高价购买。进口的原料不好买，多储备一些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只好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降低产品成本。

小企业有“三愁”，即：原料“愁买”、商品“愁卖”、资金“愁少”，长期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只是勉强维持，难以实现大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三、企业合营，向规模化发展

1951年，成立“天津市牙粉牙膏联营社”，原料联合收购，产品联合推销，从分散走向集中，为争取公私合营创造条件。加入联营社的8家企业都是同业公会的会员，推选民生牙粉

厂的李泽民为副主委，办公地点在河北区律纬路择仁里。联营社成立后，联合采购部分原材料，创出新产品“光荣牌”牙粉，分大袋、小袋和瓶装3种包装，由联营社联合推销，社内各成员自己品牌则仍各自销售。联营社生产经营的品牌有：协丰化学厂的金鸡、民生牙粉厂的白鹅、积丰化学厂的牛牌、松茂合记的鸵鸟、正孚工业社的飞舟、同昌行的老火车和炮车、瑞华化学厂的口洁素、中国化学厂的白毛女等品牌。到1953年行业调整时，加入同业公会的企业有8家，未加入的有20余家。



天津积丰化学厂“牛牌”牙粉



天津同昌行“炮车牌”超等铁盒牙粉

1954年，经联营社全体社员会议决定，将原联营社改为联合社，并作出决议，即：联合采购原材料，联合经营销售；统一使用资金，统一使用品牌，统一对外营业；按各厂职工人数分配任务。除协丰化学厂外，其余社员均参加联合社，计有：民生牙粉厂、同昌行、积丰化学厂、松茂合记、正孚工业社、中国化学厂、建国化学厂、瑞华化学厂8家企业，公推民生

牙粉厂李泽民为主委，其他社员为委员，办公地点在红桥区锅店街金店胡同积丰化学厂内。联合社成立后，由于统一采购原料和销售经营，大大节省人力，降低成本费用，同时也树立起集体主义思想，得到百货采购供应站等部门的大力支持，生产任务量足，原材料和资金短缺问题均得到解决。企业发展为争取公私合营创造了良好条件。

1956年1月，接受国家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天津市牙粉牙膏全行业公私合营。在联合社的基础上，由多家私营小企业组成“天津利民牙粉牙膏厂”，将协丰化学等厂的牙粉并入，李泽民任私方厂长，厂部设在积丰化学厂，地点在红桥区锅店街金店胡同。将中国化学厂和建国化学厂并入协丰化学厂，专做鞋油（两个厂原来也生产鞋油）。企业合并后职工人数为100多人，另设牙粉和牙膏2个生产点，即：牙粉生产点，设于原同昌行的河北区平安街42号；牙膏生产点，设于原积丰化学厂。原民生牙粉厂作为厂部仓库。原正孚工业社和瑞华化学厂交上级部门另行调整。公私合营后，在同业公会的8家企业，第一季度牙粉产量8000罗（每罗144袋），牙膏产量达到5万支。

当时生产设备仍很落后，制作牙膏用铝勺木桶，盛牙膏用水缸，仅有一台改装的电动三滚碾压机，用脚蹬灌牙膏，每人每天产量仅6000支左右，需要有2人折尾、焊尾才能完成。是年下半年，市里从轻工业部调来2台自动牙膏灌装机，大大减轻职工的劳动强度，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仅一人操作就完成原来的装管、折尾、焊尾三道工序，灌装机快车每分钟出62支，慢车每分钟出56支，日产量提高到2.5万至2.8万支。牙膏的类型由原来皂基型增加了泡沫剂型。



1957年，公私合营后的利民牙粉牙膏厂与五洲化妆品厂合并，定名为“天津市五洲日用化学厂”，又称“天津市公私合营五洲日用化学厂”，研发的产品除牙粉牙膏外，还有化妆品，职工增至400余人，后发展到600余人。牙膏产量由1956年合营时的5万支，增加到400万支。而牙粉则由于需求减少，产量逐步下降，到1958年即转到街道生产，产品主要销往外地及农村。

1964年，五洲日用化学厂按产品类别将化妆品与牙粉牙膏分开，设3个工厂，即：五洲日用化学厂，仍生产牙膏；其他两个厂名为万里化妆品厂和百花化妆品厂，专门做化妆品。工厂分设后，生产牙膏厂职工由200余人发展到300余人。

天津牙粉牙膏行业由个体经营历经联营、联合、公私合营、分设和更名。1966年，天津五洲日用化学厂更名“天津市牙膏厂”。1975年，与天津软管厂合并，职工达700人，厂址在河东区六纬路131号，河北区粮店前街51号为软管车间。两厂合并后，第一季度牙膏产量即达700万支，全年完成2800万支。到1980年，年产量达7000万支。

四、破解难题，产品升级换代

1949年天津解放后，民族工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保护和支持下，牙粉牙膏行业得到显著发展。

（一）原材料自给自足

随着经济发展，国外进口的主要原料和包装用纸逐步由国内产品代替，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原料来源于唐山建华厂的碳酸钙、天津久大厂的碳酸镁、上海新华薄荷厂和南宁土产加工厂的薄荷脑，还有天津产的糖精、人造麝香、冰片、冬青油，上海产的丁香油等。包装用的道林纸、硫酸纸及纸盒用的草板纸、



张贵庄路上天津牙膏厂厂址

瓦楞纸等也实现国产化。仅天津市就有 5 家香料厂，再有上海、广州等地生产的原料，不仅能满足国内牙膏厂的需要，还出口到国外。

早期牙膏配方表

原料名称	百分比/%
肥皂(粉状)	15.0
天然碳酸钙(粉状)	35.0
甘油	30.0
淀粉	1.0
黄耆树胶粉	0.3
糖精钠	0.2
香精	1.2

(二) 经营广开销路

20世纪50年代，牙粉全面普及，老少皆宜，成为人民生活所必需，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发展轨道。产品除国营百货站、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采购外，还有华北合作货栈代客采购，均交货付款，资金暂时不足，银行可提供贷款。国家在原料购买、贷款、市场销售等方面为企业“排忧解愁”，资金周转顺畅。天津生产白鹅、老火车、金鸡、牛牌、飞舟等品牌的企业善于经营，资金充足，市场占有率大、竞争力强，呈现出竞相发展的局面。

(三) 香型和品牌增多

白鹅和飞舟等品牌是冬青香型，老火车等品牌是玫瑰香型。行业联营前，牙粉除原有老品牌外，原生产经营金鸡牌鞋油的协丰化学厂开始生产金鸡牌牙粉，资金雄厚，人丹香型与众不同，善于广告宣传，在北京、东北等地设

专人推销，很受消费者欢迎，企业发展较快。其间，天津市场销售各地的牙粉主要有：白鹅、金鸡、牛牌、鸵鸟、白毛女、福字、古钱、象牌、东方红、老火车、飞舟、口洁素、嘉禾、西湖、天鹅、先施、嫦娥、无敌、双妹、豆蔻、银鹅、银星、风船、白塔等品牌。当时，在全国牙粉众多品牌中，天津的老火车、白鹅、金鸡、牛牌和飞舟知名度较高，称得上是“名牌产品”，其他品牌在市场也有一定的名气和占有率。



天津协丰化学厂“金鸡牌”牙粉

(四) 首次生产第一代牙膏

1938年，天津首次研制成老火车牌牙膏，为中国早期牙膏之一。30年代，华北、东北市场上开始出售牙膏，主要有：上海中国实业社的“三星”、美国的“花旗”、日本的“仁丹”等牌牙膏。当时国民使用牙膏并不普及，加之牙膏价格高于牙粉10倍左右，市场上牙粉仍处于主导地位。40年代前后，上海先后生产固齿灵、黑人、白玉、中华、留兰香、坚尔齿、叶绿素、美加净等品牌牙膏。1950年，天津积丰化学厂在原产牛牌牙粉的基础上，在全市生产富强牌，又称牛牌牙膏（盒装），随后是正孚工业社出品飞舟牌牙膏，这些天津的第一代牙膏，代表着牙粉转型牙膏的行业发展方向。

(五) 在全国率先开发特色产品

1957年，国产第一支氟化钠防龋齿牙膏研制成功，开创自主创新生产药用牙膏的先河。50年代末，曾出品“蓝天牌”留兰香型科学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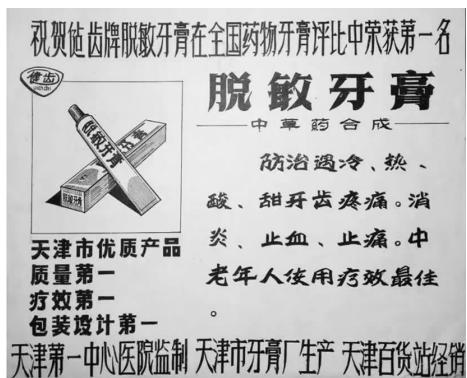


天津积丰化学厂
“牛牌”盒装牙膏

膏和“万紫千红”水果味型牙膏。当时牙膏在一些大城市需求量较大，但在东北、华北、西北，特别是广大农村仍然以牙粉为主，牙膏并未

普及。从整个市场看，天津生产的牙粉在全国各地名气大，而牙膏则属上海的产品销量大。

至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牙膏销量逐年上升。1962 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蓝天牌”磷酸氢钙高级牙膏。1965 年，与济南牙膏厂共同研制成功天然碳酸钙牙膏。因牙粉需求量逐年下降，逐渐被牙膏所代替。牙粉下放到街道工厂生产。到 70 年代，全国市场上牙膏已占绝对优势。1972 年，开发出我国第一支中草药脱敏牙膏。1978 年，在国内首次推出两款“特制”牙膏，即：具有中国民俗喜庆图案的双支装婚庆用“喜凤”牙膏；为弘扬中华文化经典，推出包装上印有《红楼梦》十二金钗图案的“红楼牌”牙膏。这时，牙粉则仅属全国个别地区所需，甚至作为刷鞋、止血等他用。



脱敏牙膏广告



“红楼牌”牙膏包装盒上印有
《红楼梦》人物图像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日报》在 1979 年 1 月份刊发一则介绍天津牙膏厂主要产品“蓝天牙膏”的广告，据查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条消费品广告。天津牙膏的生产实力和市场意识可见一斑。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的蓝天牙膏广告

自 20 世纪 30 至 70 年代，特别是 50 年代后，天津牙粉牙膏业实现长足的发展，企业性质由个体到合营，规模由小到大，品种由少到多，香型由单一到多样，生产设备不断更新，生产工艺逐步改进，成功实现牙粉向牙膏的转型，相继研发问世的多个产品获天津市和国家级奖项，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天津牙膏企业成为我国同行业的中坚。

(图片选自北京美妆历史收藏馆和《天津日报》等媒体)

(供稿单位：河西区档案馆)



河东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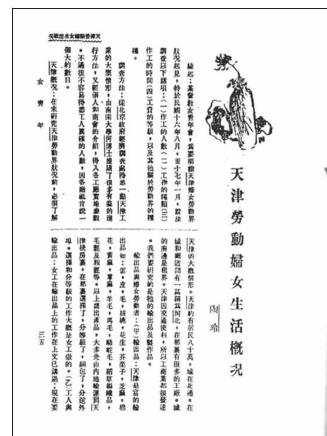
曲振明

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一贯重视劳工教育工作，特别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为贯彻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借助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下简称天津女青年会）的妇女劳工学校，团结和教育了大批妇女职工。中国共产党与妇女劳工学校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此前这些内容多为当事人的回忆，随着民国报纸杂志数据库的开放，当时的一些内容呈现出来，使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和充实了。笔者翻阅相关资料，特将中国共产党与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的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一、妇女劳工学校的基本情况

天津女青年会成立于1913年3月25日，相继设立德育部、学生部、少女部、劳工部（职工部）、会员部（成人教育部）、宿舍部等。其中，劳工部根据1923年中国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有关倡办劳工事业的决议成立，决议要求：“在烟台、天津、上海等工业昌盛之区，一面从事详确精密之调查；一面制造改良工业环境之正当有力舆论。更实际组织各种女工人俱乐部，皆以增进工人之教育及娱乐机会，消除劳资双方之冲突，以及改良妇女之生活环境为宗旨。”^[1]1927年，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派美国人章秀敏（L.Johnson）和中国干事陶玲到天津调查女工状况，了解到天津一些工厂的女工状况不佳，工作时间长、待遇低、环境恶劣，

感到应为女工提供服务，以改善她们处境。当时，女工比较集中的有大王庄英美烟公司、小刘庄裕元纱厂和西沽丹华火柴厂等。劳工部的工作方针是为劳动妇女服务，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改善处境，帮助她们知晓国家大事。陶玲回到上海，写了一篇《天津劳动妇女生活概况》，发表在中国女青年会的刊物《女青年报》上。文中谈到天津劳动妇女分布，介绍了卷烟工业女工的情况，“香烟厂：在小的香烟公司内不用女工，不过大的是用的，大约三千六百名工人中有二千是女的，她们的工作，大概是包香烟或装香烟盒子”^[2]。其所说的大的香烟厂就是有3600名工人的天津英美烟公司。文章还谈到天津劳动妇女的工作时间、工资收入、设备及劳动强度。随后，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将成立妇女劳工学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陶玲《天津劳动妇女生活概况》

[1]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记录》，1924年，第184页。

[2] 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编：《女青年报》，第7卷第5期，1928年6月，第35页。

1928年，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在女工集中的工厂附近，即英美烟公司所在的大王庄、裕元纱厂所在的小刘庄以及丹华火柴厂所在的西沽，陆续建立了妇女劳工学校。

首先，建立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那时，位于大王庄六经路的英美烟公司天津工厂有妇女劳工2000余名。天津女青年会通过走访，得到了厂方的同意，并提供一些开课应用的用具。劳工学校校址选择位于六经路与七纬路交口的新民小学，与英美烟公司相距只有一个路口。该校校长靳子屏，河北饶阳县人，曾经在天津女青年会工作，1922年在教友与同乡的赞助下成立新民小学，是大王庄第一所小学。

1928年9月20日，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正式开学，时有学生52名，大多数为英美烟公司女工，教员最初由新民小学教师担任（女青年会每月赠送车资8元）。

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开学后，天津女青年会“欲假第一区裕元纱厂成立一处，并拟在西沽专为女工设立一处”^[1]。裕元纱厂有女工900名，学校租借小刘庄德源里一处民房办学；西沽的劳工学校设在西沽公理会。由于西沽距离天津女青年会较远，学校由西沽公理会管理，另外两处由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直接管理。妇女劳工学校校长为卢定生（教育家卢木斋之女，曾任木斋学校校长），具体教学由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刘纯懿负责。此外，刘纯懿还担任两所学校教学工作。

妇女劳工学校最初也称“千字课班”，这与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密切相关。平民教育运动由中国青年会智育部干事晏阳初发起，在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等热心人士支持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妇女劳工学校办学所用课本



平民千字课课本

《平民千字课》共有三册，由陶行知、朱经农编写，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其中第一册，有30课，300个生字。每课上面是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画，中间是用简单白话韵语，最下面一行是生字。如第六课《工读歌》：“认识字，好读书，工人不是本来粗。读书，识字；识字，读书。上学几点钟，游玩几点钟，做工几点钟，大家要求学问要劳动。”^[2]第二册，编入300个生字，分若干课，但编法略变，每课掺入多个生字不等，列题目撰成白话数句或编成数十个字的故事。第三册，编入400个生字，形式与第二册差不多，不过每课文字略多，还渐次灌输一点平民知识和思想。第二、三册里面都掺入几个儿歌点缀，以上三册共计1000个生字，故称千字课，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便可学完。因此，妇女劳工学校每季度都有学生毕业，到时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举办毕业仪式，颁发毕业证书与奖品。随着一期一期学生毕业，学业也往后延长。妇女劳工学校将教学划分成三级，即初级、高级、特级。千字课为初级，毕业后可进入高级，学习国语、算术、史地、尺牍等课。高级毕业后，再进入特级，学习经济原理、

[1] 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编：《女青年报》，第7卷第7期，1928年11月，第52页。

[2] 陶行知、朱经农编：《平民千字课》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第8页。



经济思想史等。

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办学时间最早，办学条件最好。1936年11月，搬迁新址，并报天津教育局备案。时教育局派民众教育馆前往调查，认为“该校教室宽大，学生整齐，与所呈立案用表各项无不合等情”^[1]，使天津教育局也感到“想见贵会对于教育努力设施，无任钦佩，此后该地之贫苦妇女，不患求学无所矣”^[2]。

天津女青年会每年“五一”组织女工在新民小学开展纪念活动。1933年，因为“五一”各工厂不放假，故劳工部于4月30日下午在新民小学召开劳工纪念会。那天，有英美烟公司、裕元纱厂、和记洋行、正昌烟草公司等工厂女工代表及中西女校学生共五十多人出席纪念会。女青年会还聘请《益世报》主编罗隆基到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为女工做报告。

据1934年9月23日《益世报》文章《介绍为女界服务之天津女青年会最近工作之一斑》，谈到女青年会所做的第三项工作：“本会对于无力入学的劳工妇女，在工厂附近设千字课班，目下劳工学校有两处：一在大王庄，一在小刘庄。劳工界妇女入本会学校者甚多，尚有多数劳工子女欲入学者，惟以经济问题，本会目下尚未能扩充校址，以供多数劳工妇女之需求。”说明劳工学校不仅为女工欢迎，也受到女工家属的欢迎。后来，女青年会限于资金问题，劳工学校只保留大王庄和小刘庄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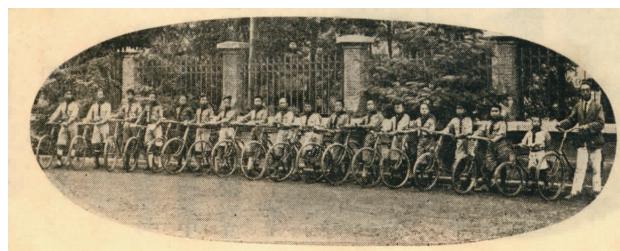
二、党组织在大王庄劳工中开展的工作

1924年，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决定以发展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天津党组织领导了三次声势浩大

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人阶级积极参与并发挥了主力作用。

河东大王庄原为俄租界东区，1924年，北洋政府接管俄租界改为特别行政三区。这里有许多外资企业，如英美烟公司天津工厂、开滦矿务局河东煤场、太古洋行东栈、美孚石油公司河东油栈、亚细亚火油公司河东油栈等，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为了在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1926年初，中共天津地委派靳子涛在大王庄开展工作。

靳子涛（1906—1975），又名金城，河北饶阳人，是新民小学校长靳子屏的胞弟。在天津医专学习时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他利用靳子屏开办的新民小学，发展教员张粲三、韩凤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大王庄党支部，还在大王庄余里韩凤珍家设立秘密活动点。时天津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傅茂公（后名彭真）经常到此活动。为了在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靳子涛经常深入英美烟公司、开滦矿务局河东煤场以及泰隆地毯厂等企业。1927年，“在靳子涛的领导下，办起了大王庄工人夜校，由韩凤珍、雷兴学任教员，发展工人党员，开展红色工会的工作”^[3]。夜校校址在新民小学。



河东大王庄新民小学

[1]《致天津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函复设妇女职工学校应准立案函》，《天津教育公报》第11期，1937年2月，第11页。

[2]《致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函为该会前在大王庄设立之平民学校已迁入新租校址请查照等因除予登记外函复查照函》，《天津教育公报》第7期，1936年12月，第18页。

[3]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沽上春秋——河东党史资料汇编》，1990年4月，第5页。

1928年秋，中共天津市委调整下属组织，建立特别三区区委，区委书记为靳子涛，管辖海河东岸大王庄、大直沽、郑庄子一带的大王庄支部、裕大支部以及草场庵支部。1928年12月，天津英美烟公司爆发了为期一个月的罢工斗争。工人在争取权益的同时，提出由厂方出资创办工人子弟学校的要求。这场罢工斗争得到地下党的支持，在为争取工人利益上，经党组织的指示，张友渔同志以天津市政府科长身份发挥了作用^[1]。1929年1月9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刊载《北方四千烟草工人的斗争》一文，介绍了天津英美烟公司4000余名工人大罢工的情况。1929年，中共特别三区区委的振兴烟草支部工作很积极，并决定在烟厂试办工厂小报，借此在工人当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29年5月、6月，由于内部叛徒出卖，中共顺治省委、天津市委及各区委遭受破坏，致使傅茂公、郭宗鉴、靳子涛、詹大权、叶玉文等同志相继被捕。当敌人搜捕新任特别三区区委书记阎怀聘时，适逢与靳子涛进行工作交接，靳与阎一起被捕。不久，阎怀聘叛变，领人搜捕傅茂公。在傅茂公家埋伏的特务又将找傅茂公的大王庄支部成员张粲三抓捕，致使大王庄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

据历史文献《1932年11月天津工作报告》在关于“组织”情况中说，当时天津有党员35人，其中河东地区14人，“英美烟草支部三人”^[2]，可以看出当时烟厂党组织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堡垒。

[1] 张友渔：《我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片段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46页。

[2]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沽上春秋——河东党史资料汇编》，1990年4月，第9页。

[3]《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86页。



天津英美烟公司女工工作场景

1935年下半年，中共天津市委在海河以东贫民区建立中共河东区委，区委书记为于会云。区委以天津民众教育馆、泰德里民众学校为掩护，在贫民区、颐中烟草公司（1934年英美烟公司更名为颐中烟草公司）等处发展党员，并开办了工人夜校，于会云为夜校负责人。

三、党组织利用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开展抗日工作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表《为反对国民党汉奸破坏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再宣言》，指出：“在首先发动抗日救国的学生及文化界努力宣传组织之下，是更加使这一抗日救国斗争，深入农村、工厂、兵营与各界广大群众中去。”^[3]3月8日，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结合城市工作特点，中共天津市委妇女工作部部长张秀岩与三八学校教员董明秋、董劲秋、张印芳、吴虹弗成立了天津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除每周组织不定期活动外，还出版《妇女园地》（后改《天津妇女》）进行抗日宣传。



张秀岩（1901—1968），河北霸县人。早年，在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一起投身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她与朝鲜族青年李铁夫一起从北京被派到天津，并在革命斗争中结为夫妻。李铁夫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秀岩在天津市委负责妇女工作。

那时，地下党利用租界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张秀岩的公开身份为北宁铁路局职员（一说为《国闻周刊》记者），她领导的天津妇女救国会“也通过教会关系进行活动”^[1]。由于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邵漪容是妇救会成员，也为宣传抗日活动提供了条件。邵漪容，浙江宁波人。中学读书时投身“五卅”运动。193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后到天津女青年会任劳工部干事。其利用在妇救会工作之便，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据妇救会成员朱峥回忆，“张秀岩同志（当时市委妇委老张先生）还开训练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



李铁夫同志和张秀岩同志一九三六年
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摄影

李铁夫与张秀岩合影

杨秀峰同志还到女青年会讲演过。吕骥同志也到那里教过歌”^[2]。

妇救会除了在女青年会进行讲课，还组织开展一些活动。据董明秋回忆，妇救会“还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展活动，与女青年进行联系。如在女青年会组织歌咏会，教唱《五月的鲜花》等歌曲，组织妇女参加战地救护训练，去绥远抗日前线慰问”^[3]等。

妇救会成立不久，就注意在劳动妇女中开展工作。1936年3月，张秀岩出面与邵漪容协商，决定利用女青年会大王庄妇女劳工学校开展抗日宣传和革命教育，推动青年妇女走上革命道路。据天津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回忆，“从1936年秋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共天津市委妇女工作负责人张秀岩同志经常到邵漪容家（当时邵是天津女青年会会员部兼劳工部干事），研究如何在女青年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青年妇女走上革命道路。当时邵是非党积极分子。张秀岩同志还经常和她研究如何进行女青年会会员工作，并帮助邵物色大王庄女工夜校教员”^[4]。

关于物色教员，董明秋回忆，“同时还在女青年会开办的夜校讲课，妇救会会员宋思纯、地下党员高惠如、郭明秋等同志先后在大王庄附近的女工夜校任过教。学员大都是颐中烟草公司的女工，约二三十人。他们一边教文化，一边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以启发女工觉悟。上述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是当时女青年会干事邵漪容同志”^[5]。

[1] [2]《抗战前夕天津“妇救会”（女同学会）的活动情况和七七事变后地下党在工人中的活动情况——访朱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天津党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3] [5]董明秋：《回忆天津妇女救国会的一些情况》，《和平区党史资料汇编（1919—1949）》，1993年11月，第87页。

[4] 郑汝铨：《我所知道的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60页。



女青年会妇女劳工学校

邵漪容是非党积极分子，张秀岩帮助她物色学校教员，介绍共产党员高惠如、郭明秋、妇救会会员宋思纯等到学校教书。妇女劳工学校按不同年龄组成不同的班级，按不同班次制定不同的学习时间。高惠如在传授初小课程的同时，还讲述革命道理，如“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由来、妇女解放的意义、苏联妇女的生活和地位等，说明共产党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女青年会每周日组织“友光团”活动，党组织在大王庄劳工学校每周活动时，通过请人做报告、唱歌、演活报剧等形式，向女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7年“三八”妇女节前后，党组织请本市一些进步学生讲“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宣传妇女解放等。这些进步学生还参加每星期日下午女青年会举行的歌咏会或报告会。1937年春的一个星期日，女青年会劳工部举行春游，邵漪容带着部分女工到北洋工学院（天津西沽）看桃花，一些进步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活动中，北洋工学院孙景芳同学教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另有一个北洋工学院同学做时事报告，讲述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女工不仅识字，还能写出反映自己生活的文章。1937年，在女青年会“五一”纪念会上，大王庄与小刘庄劳工学校展开才艺竞争，其中大王庄的作文与习字，小刘庄绘制的各省份图展现了各自优势。女工

还讲演了自己写的文章，其中《大王庄的黎明》《小刘庄的十二点》为纪念会留下了深刻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沦陷，妇救会通过在大王庄妇女学校的活动，调动了妇女劳工投入抗日活动的决心。同年，天津颐中烟草公司妇女救国分会成立，此后在妇救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支援二十九军抗战活动，开展宣传、募捐和慰问抗日官兵等活动。

1938年后，日本人介入天津颐中烟草公司的管理。烟厂女工在共产党和妇救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其间，天津女青年会的活动受到限制，妇女劳工学校也随之停止办学。

参考资料：

- [1]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编：《女青年报》1925—1937年。
- [2]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编：《女青年》1928—1937年。
- [3]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务季刊》1930—1931年。
- [4]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会务鸟瞰》，1930年。
-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2年。
- [6]天津市总工会工运研究室、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编辑部，1985年。
- [7]天津市总工会工运研究室编：《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 [8]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沽上春秋——河东党史资料汇编》，1990年4月。
- [9]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天津党史大事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 [10]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河北党史资料汇编（1919—1949）》，1993年9月。
- [11]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和平区党史资料汇编（1919—1949）》，1993年11月。

（供稿单位：河东区地方志办）



天津市东郊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吴俊侠 姜子广

天津市东丽区（原东郊区）地处津塘之间，海河之滨，素有“津门”之称。津塘公路、京山铁路贯穿全区，是通往塘沽港口和东北的两条交通动脉，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

一、民主革命时期东郊区党组织的建立

民主革命时期，东郊地区先后遭受军阀、国民党统治，日本侵占，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因此，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地区大部分为敌占区，少数村庄处于敌我拉锯状态。唯北部地区地域宽阔，芦苇成片，村落稀疏，人口分散，土地盐碱贫瘠，且集中于地主手中，贫苦农民受地主和庄头（二地主）的剥削压榨甚重，多以熬小盐、打短工和做小买卖为生。故这一地区有便于隐蔽的自然环境和较好的群众基础，为党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1.范庄子村早期党的活动。1927年，天津市东郊区范庄子村就有了党的活动。共产党员许云阶在该村的天津县公立第六十二小学（以下简称范庄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随着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天津党组织的活动也被迫转入隐蔽。此时中共天津市委下属的河北支部，为保证力量，调共产党员孙振武（原名孙静洲）到范庄小学，以教师身份开展工作，并将在该校工作的共产党员许

云阶派往法律专业学校学习，其工作由孙振武接管。

1927年7月下旬，孙振武来到范庄，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开展秘密革命工作。当时，天津市委下设刘庄、租界、河北三个支部。孙振武隶属河北支部，该支部书记是赵之生。孙振武开始直接和市委的靳子涛（化名金城）联系，后改为同河北支部联系。孙振武在范庄小学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些革命道理，并以家访做掩护深入田间向农户访贫问苦，秘密宣传我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本质。他通过接触，秘密做当地警察所副所长、仁慈庄（原向阳村，现已拆迁）刘四歪脖子（此人手下有70余名穷人，专搞杀富济贫）等人的争取工作，激发他们的进步思想，使这些人增强爱国心和正义感，走上了正路。

2.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为了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孙振武坚持每周去市内一次，参加党的集体活动。1929年春，孙振武在市里参加省委组织的国民大戏院讲演。这天，国民戏院正在演着戏，孙振武等人进场后掐断了电话线，切断了戏院的对外联系，并派人在戏院门口假装打架缠住警察，强令停止演戏，走上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讲演。讲演结束后散发了传单。其间，孙振武还参加了在劝业场等处插红旗、撒传单、贴标语及在东门外游行示威

等活动。

1929年7月，天津市委撤销，中共顺直省委下属河北支部调孙振武到天津县公立第六小学工作，派共产党员王俊英到范庄小学接替孙振武工作。按当时小学的规定，没有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不能担任小学教员，为此，组织上设法让其顶用“王文兴”名字上任，因此，“王文兴”成了王俊英的化名。王俊英亦属于河北党组织，并受孙振武直接领导。他在范庄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从舆论上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王俊英以学校为阵地，向学生、教员及当地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及共产党主张。王俊英常对学生们讲，“你们长大了要参加革命，将来全国都要解放，穷人要翻身、分土地，组织合作社、集体农庄”等，启迪学生的心灵。王俊英平易近人，深受范庄及周围群众的爱戴，因他身材矮小，人们亲切地称他“小王老师”。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王俊英发展本村私塾教员孙恩瀛、储振礼为共产党员，在东郊播下最早的两颗革命火种。

3.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罢工游行活动。

1930年4月，中共顺直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纪念“五·一”总行动委员会，同时发动工人罢工。省委常委分赴北平、天津、唐山、直南等地，部署并领导罢工斗争。中共天津河北支部积极做罢工游行的准备工作，同时，孙振武到范庄向王俊英等3名党员传达了省委及河北党组织关于纪念“五·一”举行罢工游行的指示精神及具体部署，并指示他们于5月1日上午8点半以前，到三条石兴记铁庄待命，参加全市统一的罢工游行。

5月1日上午，孙振武和范庄王俊英、孙

恩瀛、储振礼等党员按时来到三条石兴记铁庄等候，准备参加罢工游行，一直等到9点半钟也未见河北支部来人联系。孙振武觉得情况不妙，就对3人说：“我到河北支部秘密驻地（在河北区大马路进步里）去看看，如果12点钟还不见我回来，你们就烧毁宣传品立即走开。”孙振武来到河北支部驻地附近，发现安全信号还在，就向门口走去，等他推开门进屋时，被埋伏在屋内的特务抓捕。原来河北支部已经被破坏。孙振武的被捕及河北支部遭破坏使王俊英等3名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次全市罢工游行因泄密而遭到破坏，致使一些党员被捕，天津党的工作受到损失。当时的天津《益世报》还做了大量的报道。

共产党员王俊英、孙恩瀛、储振礼因参加罢工游行而受校方怀疑，王俊英被校方辞退。同年下半年，王俊英经人介绍到盐警总署当盐警班长。在那里他想方设法秘密做灶户（晒盐的）工作，又找到贩卖私盐的商贩，使其与灶户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盐警。看到老百姓弄盐他就装作没看见，并暗中组织保护，团结大批盐户。后来，王俊英与组织恢复了联系，即受组织派遣到部队做军运工作。

二、抗日战争时期东郊区党组织的活动轨迹

1.发展党员队伍，积极参与敌后抗日游击战。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王俊英在山东益都（现山东省青州市）被捕牺牲，年仅28岁。孙恩瀛仍以教书为职业做些对革命有益的宣传工作。党在范庄活动虽然时间较短，且限于形势没有公开活动，但他们在这里发展了党员，激发了一些人的进步思想，为这里播下了



革命种子。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深入开展，敌后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敌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日本侵略者连续4次调集重兵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使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抗日，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2. 壮大抗日根据地，宣传发动群众。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挺进敌后”的指示精神，1942年秋，由冀热边特委第十三地委和青英部队派刘征、马良、孙英等人组成武工队，到金钟河南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在五处、永和、胡张庄、大份、小份、贯庄、赤土一带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壮大抗日根据地，在武工队开展工作的基础上，1943年7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决定成立中共武（清）宝（坻）宁（河）联合县工作委员会。不久，改隶属冀热边特委第五地委。同时成立政权机构——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由于斗争形势艰苦复杂，机关驻地无固定地点。

3. 强化组织领导，配合主力作战。中共武宝宁工委和联合县办事处成立后，划分为3个区，后又划成4个区，各区均设立区委、区公所。东郊地区属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一区。其区域范围：东起蓟运河，西到市区边缘和小淀一带，北起大贾庄、俵口、邢家坨一线，南至海河。一区范围内的金钟河以南，除部分村庄外，其余大部分仍为敌占区。1944年3月，武宝宁一区干部10余人冒雨来到金钟河南捣毁了赤碱滩（该村1942年底改为赤土村）伪

大乡。随着地区的扩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1944年9月，中共武宝宁工委和联合县办事处在武宝宁二区郑庄子一带召开会议，会议由工委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方纲主持，决定把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所辖4个区划分为8个区，并部署了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工作。东郊区一带属六区，其范围是：北至潘庄、大贾庄以南，东至潘庄、东塘坨、淮淀、胡张庄、中心庄一带，西到市区边缘和小淀一带，南至海河沿岸。六区建立后，正式成立了地方武装——区小队。区小队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反特，打击小股敌人，保卫游击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44年11月，区小队逮捕、枪毙了赤碱滩伪大乡长魏锡山，成立了赤土村抗日民主政权（也称抗日民主政权委员会）。同年12月，区小队袭击了程林庄自卫团据点，俘虏敌军六七人，缴获枪支五六支。当时形势虽趋于好转，但环境仍复杂恶劣。全区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地方政权。这些工作首先在赤土、于堡、山岭子、胡张庄等村秘密铺开，并先后建立了村政权。与此同时，建党工作已逐步开展起来。1944年底，先后发展胡张庄村鲍德贵、李场子范自臣、于堡村朱兆祥等人入党。1945年1月，刘顺华、刘振英介绍赤土村魏义才（贺民）入党。4月，魏义才等介绍本村魏贺尧、魏振奇、魏慎礼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赤土村党小组，魏义才任组长（亦称魏义才小组）。截至1945年9月，六区区干部有20余人，全区党员60余人，但多数党员分布在金钟河以北部分村庄。这些党员干部在1945年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为配合主力部队作

战，积极带领全区军民拆铁道、扒公路、割电线、毁桥梁，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东郊区党组织蓬勃发展

1.东郊区党组织实力得到充实。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从晋察冀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来到天津市郊农村。8月28日，冀中区党委召开天津工作讨论会，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是：围困威胁天津市，秘密开展市郊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逐步向市区压缩，相继潜入市内，在不过分刺激敌人的策略下，以待形势变化。并根据这一指示，宣布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津委会”）。9月1日，“津委会”决定成立5个市分区委。10月9日，正式成立中共天津县委和天津县政府，归冀中直接领导。11月25日，改由冀中九分区所辖。1946年7月，八、九分区合并为八分区，天津县又隶属于八分区所辖。天津县下设7个区，现东丽区即属天津县一区。

2.革命力量在东郊区蓬勃发展时期。区委、区公所领导经常带领干部到大毕庄、欢坨、孙庄、荒草坨、赤土一带发动群众，巩固发展各村民主政权，成立村农会，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挂牌”斗争，即摘掉国民党政权的牌子，挂上民主政权的牌子。在此期间，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45年10月，区干部李仁等在南孙庄发展了刘旭俊、刘旭全（刘芳）、孙良等人入党。1945年秋至1946年春，由区干部张炳臣、王志远等在胡

张庄、五处一带先后发展魏俊福等10余人入党。1946年秋，胡张庄建立了党支部。

3.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领天津县大部分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逮捕枪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使革命遭到重大挫折，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基本陷于停顿，工作开展十分艰难。1946年9月8日，为便于开展工作，冀中区党委决定将中共天津县委和中共武清县委合并为中共津武县委。原天津县一区改为津武县十区，区划范围不变。至1946年11月，为便于对敌斗争，津武县十区委改由冀东第十五地委所辖宁河县委领导。宁河县设8个区，东郊地区属宁河县第六区（原津武县十区）。其范围是北起小淀、东堤头、西堤头、冯台子、王台子，南到海河沿岸，东起王台、胡张庄、军粮城一带，西至市区边缘。这一时期，区委、区公所在流动中坚持斗争，发动群众，发展民兵组织，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县大队，袭击敌据点，打击和消灭小股敌人。1948年12月19日，军粮城地区解放，新建为宁河县九区。同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攻占张贵庄机场。至此，除万新庄、增兴窑等几个靠近市区村外，东郊区全境解放。

参考资料：

- [1]中共东丽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金钟河畔的烽火》，《东郊党史资料汇编（1927—1949）》，1992年4月。
- [2]东丽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正在消失的村庄》，2018年3月。

（作者单位：东丽区档案馆）



梆子名角刘香玉在杨柳青

张一然

河北梆子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统称的^[1]，原称梆子戏、老梆子、京梆子、直隶（指河北省）梆子、卫（指天津卫）梆子、秦腔、秦剧等，曾与京剧争盛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梆子剧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于1952年参加了全国戏曲汇演。那时候，河北梆子艺人纷纷集聚起来，组成新的演出班社，政府派干部积极帮助艺人开展工作，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很多河北梆子剧团。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是1953年于杨柳青镇成立的天津地区试验剧团。

天津地区试验剧团属全民所有制，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舞台艺术面貌，乃至演员的思想觉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性的改革。对经历了“一不养老，二不养小”的旧社会班社、戏班的老艺人而言，国营剧团少有所教、老有所养，彻底消除了老艺人加入剧团的顾虑，为他们在艺术上的精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故而，天津地区试验剧团曾汇聚诸多曲艺名家齐聚古镇杨柳青，著名的河北梆子名角、被誉为青衣行当代表人物之一的刘香玉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年，刘香玉与北京的李桂云、天津的韩俊卿形成京、津、冀河北梆子三足鼎立的青衣行当代表人物之一。其早年命运多舛，作艺八年，于桃李年华退出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她

得以复出演戏，而杨柳青正是其艺术第二春的焕发之地。

生于佃农之家 天生爱戏
刘父为谋财 送女儿学戏

刘香玉，1908年出生于河北省涿州，因出生时体重8斤，接生婆认为这是吉兆。毕竟在旧社会因医疗技术落后，新生儿体重过重往往都会遭遇难产，很难存活。刘香玉的母亲郑氏娘家有个亲戚，绰号“杀疯子”，会看风水，还会相面。“杀疯子”见到刘香玉就断其“贵人临门，刘家必得大富大贵”。因此，刘香玉的父亲刘成财便称呼小香玉为“贵人”，并要求一家老小都要如此称呼。

刘香玉的家庭是贫苦手艺人家庭，父亲做长工打短工，爷爷干木匠活，母亲郑氏则拾柴禾、烧火做饭，纺线做衣。全家人都非常辛苦，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拮据的日子一晃过了六七年，“贵人”的到来，并未让刘家大富大贵，本就重男轻女的祖父对“贵人”颇有怨气，见了她就没好脸色。

清末民初时期，每年封河上冻后，常有穷苦艺人结伴到涿州乡下唱戏。小小的“贵人”对一年难得的文娱活动非常感兴趣，常常是从头看到尾，戏啥时候演完她啥时候回家。每次看完戏，她就模仿戏里的人物，用秫秸插头上扮

[1] 王星荣编著：《地方戏集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5页。

作“头面”，模仿梆子腔的演员咿咿呀呀地唱。

“贵人”七岁那年，村里财主过寿，堂会连办了好几天，“贵人”趁机挤在戏楼门口整整看了十天的戏。回到家里，她便扯开嗓子唱那些听过的戏。

村里唯一坐过科，唱过大花脸的街坊孙和听到“贵人”的戏，觉得这是一个好苗子，便主动向刘成财介绍起一条发财的门路——送“贵人”去学戏。

孙和告诉刘成财，家附近的天津卫，南边的上海滩，甚至是紫禁城，都时兴起女子戏班，坤角特别容易唱红，红了以后就有大把的钱财进账。穷了半辈子的刘成财动了心，但没有拜师学艺的门路。孙和又出主意，让“贵人”拜“一条鱼”为师。因孙和有关系能和“一条鱼”搭上话，并且愿意引见“贵人”拜其为师。

**有幸拜“一条鱼”为师 坐科八年
师父赐名“刘香玉” 出师即领衔**

“一条鱼”本名陈衡喜，与梨园名伶响九霄是亲师兄弟。清光绪年间因维新变法受牵连入狱，民国初年才得以出狱。此后，“一条鱼”回到老家松林店，以收徒传艺为主。据说，“一条鱼”技艺极高，一心想要收几个女弟子教出个样儿来，带到紫禁城与故人们的徒弟见个高低。

因此，时年八岁的“贵人”顺利地成为“一条鱼”的徒弟，并被其取名为“培珍”。按照旧社会梨园的行规，刘培珍在“一条鱼”处坐科八年，工青衣。其间，“投河溺井、打死打伤勿论”。

“一条鱼”家资丰厚，刘培珍过上了吃穿不愁的生活。但“一条鱼”对她学艺要求严苛，学艺仅两年，她就掌握了《教子》《双官诰》《汾河湾》《桑园会》等十几出单边子戏。

民国六年（1917）春，“一条鱼”将刘培

珍从松林店带到北平拜会田际云先生。当时，田际云是文明茶园的掌事，刘培珍在文明茶园唱一出红一出，很是给“一条鱼”增彩。于是，“一条鱼”更着实卖力传授技艺，并请南派梆子花旦名角天鹅旦给培珍说《血手印》《蜜蜂记》《遗翠花》《藏舟》《断桥》等闺门旦戏，还请了刀马旦名角傅连章说《汴梁图》《双锁山》等刀马戏。由此，刘培珍技艺大进，隐隐已有了成角之势。此后，她又拜“小蜜蜂”为师学青衣戏。1924年，16岁的刘培珍学成出师，即领衔演出，“一条鱼”给她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刘香玉。

这些消息传回老家，父亲刘成财进京找到了闺女。“一条鱼”告诉刘成财，现在的世道兵荒马乱的，刘香玉刚刚16岁应该继续待在北京，仍由“一条鱼”负责演出事宜，刘成财负责日常照顾刘香玉。“一条鱼”每天交给刘成财3块现大洋。常年贫困的刘成财哪见过现大洋，赶忙同意了“一条鱼”的建议。由此，刘香玉真的成了刘家的“贵人”，每月都能帮家里挣到近百现大洋。

唱戏是功夫活，需要演员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但刘成财只想攒钱回乡买房置地，对每天早出晚归、连轴登台唱戏的刘香玉并不宽待，玩命地节俭各种开销，吃喝也是异常简约，根本不心疼劳苦的闺女，更不懂得照顾人。时间长了，十几岁的刘香玉身体越来越虚弱。

**刘父为钱闯关外 压迫女儿每天三工戏
香玉累晕在舞台 颠沛流离致刘母辞世**

刘香玉越来越有名，她的父亲、爱财的刘成财被关外来京组班的狠人刘印盯上了。刘印许诺至少每月给150块现大洋，并贴肉面等不一。刘成财一听，每月比“一条鱼”多给50块现大洋，见钱眼开，完全不顾刘香玉的师徒情



分，立马跟刘印签了合同。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刘香玉尽管明知此举亏欠了师父“一条鱼”，几经挣扎但也毫无办法，只得跟着父亲闯关外了。

刘印是纯粹的生意人，与刘香玉没有香火情，根本不顾她的死活，每天三工戏，尽是硬戏码，再加上达官贵人们的点戏，累得十几岁的刘香玉天天是下了戏台，头面都来不及摘就能睡着。为了绑住刘香玉，不到一年时间，刘印就将份钱涨到了每月两百块现大洋。直到有一次，刘香玉高烧 40 度，刘印依旧让她登台，刘香玉上台后没走两步就晕倒在台上。刘成财才明白，万一闺女有个好歹，他是一块现大洋也挣不到了。这才让他下定决心，合同期满后离开刘印。

合同期满后，刘香玉辗转到各处搭班唱戏，由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她被戏班主压迫过，还被土匪头子围追堵截过，幸好逃命途中遇到锦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俞先生。俞先生在家乡兴办慈善事业、修桥铺路、办学堂放粮仓，在锦州一带很有影响力。俞先生平日没少看刘香玉的戏。俞先生办事途中，被刘香玉的母亲拦了车，问清缘由，经其说情，刘香玉才逃过一劫。

最令刘香玉难过的是，母亲郑氏跟着刘成财、刘香玉常年背井离乡，因长期担惊受怕，加之生活的流离转徙，不幸辞世。失去母亲的刘香玉重孝在身，想起母亲就难掩泪水，根本无法登台演出了。加之刘成财每到冬季就犯哮喘病，关外天寒地冻，哮喘更加严重，只得带着闺女奔了唐山。

催促香玉嫁人 谋个靠山
师父放下隔阂 香玉大红

从关外回到唐山后，刘香玉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大戏班，过着不安稳的生活。失去了老伴

的刘成财萌生了让香玉嫁人、给爷俩寻个依靠的心思。

可巧，唐山洋灰公司的董事刘沛亭是个十足的戏迷，有一次串演文明戏时，跟刘香玉搭过戏。两个人由此算是有了交往。刘成财着急给女儿寻个靠山，寻思刘沛亭是个不错的人选。经人撮合，刘香玉便和年长其 16 岁的刘沛亭结了婚。刘成财要求香玉婚后照常演戏，收入归他所有，刘沛亭同意了。每月只管收钱的刘成财也过上了省心的生活。

刘沛亭十分喜爱刘香玉，对刘成财的一些苛刻要求完全不搭理。婚后的刘香玉有了有钱又体面的刘沛亭做靠山，演出的事不再是刘成财一言堂了，日子渐渐和顺起来。

1927 年，虚岁二十的香玉回到天津，在“大舞台”挂牌演出。这时候，天津演戏流行挂门帘台帐。刘香玉没有这些东西，显得不上台面。经人引见，想要借用已改演话剧的坤角陈小霞的门帘台帐救急。

陈小霞的家在南市，是一座二层小楼。没想到的是，刘香玉进了陈家的客厅，才发现陈小霞的父亲正是“一条鱼”陈衡喜。她当即跪拜师父，一边痛哭一边赔罪，但“一条鱼”寒了心，并不买账。有人告诉刘香玉，“你不把老爷子的面圆回来，往后在天津卫怎么立脚啊？”本就顾念师父的刘香玉更希望师徒和气，况且当年闯关外并非本意。于是，她请著名的大弦琴师王八子（张明义）、“一条鱼”的原配夫人出面说情，又在知名的大饭庄摆了一桌席面。念旧的“一条鱼”才由此放下以往的隔阂，爽快地把门帘台帐借给了香玉。师徒俩由此恢复了往日的来往，“一条鱼”更是爱惜徒弟，此后常常提携刘香玉。

“一条鱼”与北京奎德社主持杨韵谱先生是师兄弟，经“一条鱼”的引荐，21 岁时刘香玉

入了奎德社。在杨韵谱先生的指导下演出了《庚娘传》《珊瑚传》《翠屏山》等戏，因戏好人不娇，博得杨先生“演戏瓷实、为人厚道”的评价。在天津，刘香玉彻底成了红角。百代公司为她灌制了《哭长城》《宋金郎》《铡美案》等戏的唱片。

此时，刘香玉因常年劳累，又得不到良好的休养，患了肺病。23岁那年，她因病退出北京奎德社，回到天津静养。

经过数年的休养，刘香玉身体渐渐好转。但她想起八年学艺、八年作艺的辛酸生活，尤其是作为旧社会的“女戏子”，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所以即使身体好转，也不打算再登台了。

做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 复出登台 为国家多培养戏曲人才 不枉此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搭档云笑天、梁大达子、筱翠云动员脱离舞台十九年的刘香玉重登舞台。老搭档们告诉刘香玉，过去的“戏子”如今是堂堂正正的文艺工作者，不再是“下九流”了。时年四十多岁的刘香玉动了心。

在云笑天等人的邀请下，她不仅重新走上舞台，还一起组织了“云香剧社”，并任社长兼主演。

时隔多年未登台的刘香玉头天登场唱的是《忠保国》。没想到，十九年没唱戏，她连凤冠都戴不住，头面勒得她头晕脑胀，上场就出虚汗。她花了足有半年的时间，才渐渐重新适应舞台生活。

1954年，在天津市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她凭借《断桥》一剧荣获演员一等奖。这让她激动不已。

经天津专区领导的动员，刘香玉于1955年加入了位于杨柳青的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任头牌主演兼业务团长。入团后的刘香玉一边带学生，一边演出，为剧团增添了《夜宿花亭》

《血手印》《三上轿》《南北合》等剧目，提高了剧团的技艺。

在杨柳青的日子，刘香玉是非常繁忙的。她不仅要参加排练、完成演出任务，又要处理剧团的行政事务，还要带徒弟、培养青年演员。繁忙的工作使刘香玉很难有专门的授课时间进行系统教学，她便利用下乡演出的路途时间为徒弟说说唱念或是身段表演。

在旧社会吃过苦的刘香玉保持了一贯的艰苦作风。在杨柳青表演期间，她发现公主角色的旗袍颜色太素了，身为团长的她并没有申请经费，而是托人买来色彩鲜艳的碎布和花边，亲自动手改制旗袍。徒弟穿上她改好的旗袍上台，一亮相就得到观众的认可。

在杨柳青期间，刘香玉从老艺人迅速转型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从过去的徒弟、名角迅速进入团长角色，带好班子，管理好青年演员。她不准学生们在后台说笑打闹，也不能看书看报……她告诉年轻人，后台也是台，那样容易误场，情绪也进不到剧情之中。她总结了一套训练发声、气口、咬字、行腔的教学方法，勇于创新，从不保守，培养了不少唱功水平颇高的演员，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表演艺术家”称号。

1964年，她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从此专心于戏曲教育工作。曾任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剧协理事。

每当有人问起她的平生经历，她总是说：“我这辈子有酸有辣，有苦有甜。”1980年，退休后的她又回到第二故乡天津。年已古稀时，刘香玉曾在采访中说：“我已经快八十的人了，还能活几年，为国家多培养几个学生，也没白活在世上一回。”1991年2月，刘香玉先生在天津市永安道的家中病逝，享年83岁。

(供稿单位：和平区档案馆)



历史上的宝坻陆路交通

王宗征

历史上的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处于九河下梢和漕运要冲，水运十分发达，陆路交通也因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其域内形成了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相向而行、并举式发展的格局。

宝坻，处在华北平原东北部，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因素，在漫长的时间里，域内公路都是土路。早在旧石器时代，宝坻的先民们在从事原始生产活动过程中拓出了一条条原始的道路，即用于行走和运输物品的土路。进入奴隶制时代，其生产活动规模扩大、商品交易增加，原始的道路得到了拓展和延伸。据对宝坻历史遗迹考证，周朝时这一带通向四方的土质道路至少有4条之多，一是往东，经无终（今天津市蓟州区和河北省玉田县），去令支（今河北省迁安市）、孤竹（今河北省卢龙县）；二是往西，经三河（今河北省三河市），去蓟（今北京）；三是往南，通齐鲁；四是往北，经无终，翻过燕山，去山阴（今河北省承德市）和鬼方（今内蒙古赤峰市）^[1]。

据乾隆十年（1745）宝坻县令洪肇楙主

持编纂的《宝坻县志》记载，秦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曾率大军攻打燕国，在相当于今天宝坻城南十里的地方驻扎军队，并修筑城池（史称“秦城”）^[2]。当时，此地已经有兵马可行的驰道。

汉朝初年，置雍奴县（今宝坻区域为其辖区一部分），境内已经有了更为正规的道路。东汉建武二年（26），“渔阳太守彭宠反，攻幽州牧朱浮于蓟”，光武帝刘秀派兵东征平叛，曾把军队驻扎在雍奴，此时宝坻境内不仅有正规的驰道和驿道，而且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北行可至无终；东行可达碣（今河北省昌黎县）；东北行至右北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往西行可达燕京（今北京），更远可到达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南行则可以到达东平舒（相当于今河北省大城县、天津市静海区和津南区）^[3]。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唐朝初年，“夏王窦建德与高祖李渊争夺天下，攻幽州不克，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县，为幽州总管罗艺所败”^[4]。此时，雍奴至幽州（隋唐时北方的

[1] 天津市宝坻县交通局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著：《宝坻公路交通史》，1986年印刷。

[2] 洪肇楙主编：《宝坻县志》，乾隆十年（1745）刻本。

[3] 天津市宝坻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纂：《宝坻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4]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治所今北京一带，管辖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已经有了畅通无阻的大道。

至辽代，宝坻属于辽国管辖，因盐业发达等原因，水路和公路交通都有较大的发展。那时设立的新仓镇（今天津市宝坻城区核心地带）成为被视为国宝的盐的集散地和贸易重地，各路富贾在新仓云集，进行盐的贸易，新仓镇的交通运输业更加兴盛，运盐的陆路交通像水路一样向辽国更远的地方延伸，最远可到达相当于今天的我国东北广大地区。

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二月，金军在应州（今山西省应县）境内俘虏辽国天祚帝，辽朝宣告灭亡，宝坻纳入金国版图。金大定十一年（1171），金世宗完颜雍视察新仓，发现这里盐业兴盛，商贸流通发达，人口密集，认为有升格新仓行政建制的必要，便下诏于大定十二年（1172）设置宝坻县，并命令修筑县城城墙，按县城所设四门，修筑通向四方的主干道路。宝坻向外延伸的陆路交通以及运输得到了更大发展。

元至清代，处于京东的宝坻被视为京畿要冲，军事和经济战略地位尤为显要。宝坻境内陆路交通以及向县外拓展的公路明显增加，成为京畿陆路交通的一个要塞。据史志资料记载，这时期宝坻境内设置多处驿站，除县城有驿站，县内一些地理和交通位置重要的村落也设置了驿站，传递公文的人士和来往官员途中更换马匹或歇脚、食宿等更为方便。作为陆路交通重要通道的驿路，在宝坻发展起来。

明朝时，以宝坻县城为中心的陆路交通达到6条之多，即出县城东门（海滨门），东南行至梁城（今天津市宁河区），东北行至新安镇，可到玉田县；出县城西门（望都门），西行到香河县，再到京都（今北京）；出县城南门（广川门），南行至武清县，再到天津；出县城北门（渠阳门），北行至渔阳（今天津市蓟州区），向西北行可达三河县，再到京都^[1]。

清代，用于乡村商品交易的集市在宝坻得到迅速发展，宝坻县城以及大口屯、林亭口、八门城、新安、黄庄等六大集市的设立，带动了宝坻境内陆路交通的连接与互通，各大集镇之间的交通联系变得紧密起来，为集市交易和乡民赶集带来方便。宝坻与县外的陆路交通也呈现联系紧密、路线增多、功能增加等特点。那时，宝坻陆路交通主干道路主要采取堤道（沿河堤上开拓道路）、埝道（沿渠埝建设道路）、叠道（从规划的道路两侧挖沟取土筑路，其路面高于地平面，路两侧边沟可起到泄水作用）相结合的方式，加以修建，各有所长，相互依托，构成了宝坻陆路基础设施的主要特征。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与之相配套的桥梁建设受到重视，宝坻境内桥梁逐渐增加，较大型桥梁多以木制为主，也建有多座小型石桥，大大小小的桥梁把陆路交通连接起来，促进了陆路交通从县内向县外的拓展和延伸。

据史志资料记载，清代宝坻至少有8条陆路主干道路由县内延伸到县外：一是宝坻县城经纪家园、齐家务（今西河务）、邦道沽、三岔口，过泃河入蓟州境，到达蓟州城；二

[1] 天津市宝坻县交通局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著：《宝坻公路交通史》，1986年印刷。



是县城经纪家园、桥头、焦山寺、黄沙务、新集（今属河北省三河市），入三河县境；三是县城经沙窝、莲花庄、马各庄、杨庄、黄家集、邵家铺，入香河县境；四是县城经王庄、马家店、刘里、大口屯，过青龙湾河，入武清县境；五是县城经辛庄、胡各庄、郝各庄、南小郝庄、五登庄，往南过青龙湾河，再经八道沽、大湾，入天津县境；六是县城经辛庄、胡各庄、八台港、徐庄、牛蹄河、张洪庄、黄庄、小邓庄，东行入宁河县境；七是县城经五里铺、大张各庄、后张司马庄、林亭口、张五店、八门城、张头窝、大盘龙，至丰台镇（今属天津市宁河区）；八是经白高庄、前郝庄、新安镇，向东北入玉田县境^[1]。当时，这些主干道路的筑路标准和质量都比较高，沿途桥梁众多，并有摆渡作为行人和车辆过河（渠）的补充工具，构成了宝坻陆路交通的骨干框架和主要网络，在京东地区可称“陆路发达”。

到了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由于战乱频仍和军阀混战，宝坻陆路交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土路年久失修，路面和路基破损严重，给公路交通和运输带来不利影响。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县内公路建设和路况才有所好转。此时，民国政府倡导公路建设，筑路“热潮”在全国兴起。1931 年，宝坻乘势修建了一条具有近代意义的公路，与南到天津、东北至喜峰口（位于今河北省唐山市北部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部隘口之一）的冀东主干公路之一的过境公路（津喜公路）实现了

连接。

随着近代公路在宝坻的修建，已经有少量汽车从其境内公路通过，机动交通运输工具初露端倪。民国二十三年（1934），宝坻至少有 3 条公路可通客运汽车，分别是天津至林亭口（今宝坻区林亭口镇）、天津至新开口（今宝坻区新开口镇）、天津至宝坻县城（今宝坻城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宝坻有天津至玉田县、天津至蓟县的 2 条省级公路过境。而以宝坻县城为中心的县内公路形成 4 条骨干线路，即出县城东门（时称“博爱门”），往东南方向至林亭口，为东干路；出县城南门（时称“中山门”），南行经石桥，至尔王庄（今宝坻区尔王庄镇），为南干路；三是出县城西门（时称“平等门”），向西南行，经大马庄，至彭家务（今宝坻区新开口镇彭家务村），为西干路；出县城北门（时称“自由门”），北行经牛道口，至新集，为北干路^[2]。这 4 条干路均有汽车通行，成为带动宝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公路交通干线。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侵华过程中，处于京（今北京）、津（今天津）、唐（今河北唐山）三大城市腹地的宝坻，成为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一个要害区域，宝坻公路交通成为日军侵华的设施。这期间，日军长年累月地强迫宝坻民众修筑公路，先后修筑大、小公路 30 余条，其中被称为“警备路”的公路达到 9 条，“警备路”均与日军炮楼和据点等相连接，为日伪统治宝坻提供了交通便

[1] 天津市宝坻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纂：《宝坻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出版。

[2] 天津市宝坻县交通局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著：《宝坻公路交通史》，1986 年印刷。

利^[1]。日军高压下的修路苦役，十分繁重，又充满血腥味，给宝坻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身心压力，苦不堪言。因此，在抗日救国运动大潮感召下，宝坻人民积极配合抗日武装，奋起破坏日军用于运兵和运输物资的交通道路（俗称“破道”）。扒毁日军道路，成为宝坻人民抗日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给日军交通运输制造阻碍，迟滞了日本侵略者在宝坻乃至冀东一带的“清乡”“扫荡”等罪恶行动的实施和推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宝坻人民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尽快改变县内公路交通状况，积极开展“修路复交”运动。但内战时，为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强抓民夫，修建道路。对此，宝坻人民予以抵制，开展“破交”活动，与敌军展开激烈斗争。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形成了宝坻人民一面破坏道路，阻击国民党军交通；一面抢修道路，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双重局面。1947年2月8日，宝坻县城解放。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平津战役进入筹备阶段。为了迎接东北野战军进关和支援平津战役，宝坻人民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力加强交通工作，加快整修各级公路。1947年冬，将县内原来阻击日军和国民党军所挖的沟壕填平，并在津喜公路白龙港村跨蓟运河处修建了一座19孔，长达83米的木质大桥，畅通了津喜公路宝坻段，为东北野战军进抵平津铺平了道路^[2]。尤其是1948年秋

季以后，随着平津战役临近，宝坻人民修路、建桥运动更加高涨，整修的公路又多又好，公路交通线路大规模向前延伸。在修建桥梁和整修公路过程中，宝坻人民主动出工，自愿捐献材料。经过日夜艰苦奋战，宝坻人民先后抢修了洪福寺石桥、肖家堼木桥、三岔口木桥，宝坻至三河、宝坻至香河的主要公路，沟通了与周边邻县的交通运输路线，有力地配合了平津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宝坻县公路建设取得更大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对县内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公路开始进行大规模整修。60年代后期，县内开始兴建柏油（沥青）路面公路，形成“大兴公路”热潮。这一态势在70年代得到延续和发展。80年代初，市、县、乡村三级公路交通网在宝坻基本形成，为全县公路交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

到2001年宝坻撤县设区前，累计修成乡村柏油公路645条，总长达1107.6公里，全县农村普遍实现村村通公路，网络密度为80.7公里/百平方公里^[4]。市、县、乡三级公路构成的交通网在宝坻纵横交错，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宝坻设区后公路交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宝坻区档案馆）

[1] 天津市宝坻区档案局编著：《宝坻话古今》，2011年印刷。

[2] 天津党史资料丛书·中共宝坻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宝坻革命史（1937.7—1949.10）》，1989年印刷。

[3] 天津市宝坻县交通局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著：《宝坻公路交通史》，1986年印刷。

[4] 天津市宝坻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纂：《宝坻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出版。



薊运河银鱼

孟昭林

宁河有“宁河三宗宝：银鱼、紫蟹、芦苇草”之说，汉沽地区则有“蓟运河五宗宝：银鱼、紫蟹、纤板鱼、黄金河道、芦苇草”之说，两地均将产自蓟运河的银鱼列为第一宗，足见其珍贵。

潮河银鱼都下珍

明代，宁河地区（含汉沽）属宝坻县，故古书中称蓟运河的银鱼为宝坻银鱼。明代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介绍宝坻银鱼：“宝坻银鱼都下珍，北人称为面条鱼，形似东吴鲙残而倍大，出海中蛤山下。秋深霜降后溯流而上，育于诸淀中，映日望之，波浪皆成银色。”^[1]清代《宁河县志》也有类似记载：“《燕山丛谈》载，宝坻银鱼，都下所珍。北人称为面条鱼，形似东吴鲙残而倍大，出海中蛤山下。秋深霜降，上温泉产子，映日望之，波浪皆成银色。人每候其至网之。”^[2]从中可知，银鱼形似鲙残而非鲙残。明代黄省曾《鱼经·二之法》中说：“唯银鱼、鲙残鱼嗜子于冰，冰解三日乃生也。”丁符九《宁河县志》中也将鲙残和银鱼分开介绍：“鲙残鱼，俗呼壶芦鱼，长三四寸，身圆

如筋，洁白如银，无鳞。”^[3]“银鱼，洁白如银，金眼无红者佳，冬月穿冰取之。”^[4]蓟运河银鱼与鲙残鱼相比，形状相似而“倍大”，即鲙残鱼“长三四寸”，蓟运河银鱼则长七八寸。南宋周麟之在《海陵外集》中描述，其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九十月间出使金之燕京时，金主完颜亮所赐银鱼：“银鱼长尺余，比南方者尤大。”^[5]此银鱼产自金朝统治下的大兴府沿海香河等州县，彼时的香河辖今河北省香河县、天津市宝坻区、宁河区。金大定十二年（南宋乾道八年，1172），划香河境东部15000户置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划宝坻县境东南部置宁河县。金朝香河沿海地区就是现在的宝坻、宁河地区。完颜亮所赐银鱼，很可能就出自蓟运河。20世纪50年代，蓟运河里仍可见银鱼的身影。每至冬季，笔者去蓟运河“赶暴”（冬季捕鱼的一种方法）或穿凌网，运气好的话就能捉到几条银鱼，小手指一样粗，筷子那么长。现在每至春末夏初，市场上也有卖“银鱼”的，这种所谓的银鱼，其实是鲙残鱼，蓟运河畔的人称之为“葫芦鱼”，因其半透明的头部，可见一个类似宝葫芦形状的软组织。

[1]（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六《畿辅杂记》，第137页。

[2]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980页。

[3][4]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942页。

[5]（南宋）周麟之：《海陵外集》卷一百四十九《物产一》，第2377页。

蓟运河的银鱼“出海中蛤山下”。清光绪六年版《宁河县志》载：“宁固泽国，有水而无山。蚝蛤两峰特海隅螺髻耳，非地之镇，国之主也，附存焉可已。”^[1]蛤山在蓟运河口近海的河海交汇处，由海里双壳类软体动物的介壳受水流的冲击堆积而生。产自蛤山下的银鱼每年霜降后沿蓟运河溯流而上，可一直游到蓟州，在蓟州温泉下产子，夏雾淀是银鱼洄流产子的主要聚集区。夏雾淀即蓟运河中汉沽下坞村至李自沽村的一段河湾儿，这里成为银鱼的重要产地，以至于“夏雾银鱼”成为明代宝坻八大胜景之一（康熙年间所修《宝坻县志》收录了三首明代人创作的以《夏雾银鱼》为题的诗歌）。此外，“宝坻银鱼以瓦窑头为最佳”，“瓦窑头出尤佳”^[2]。明代著名文士徐渭有《托王老买瓦窑头银鱼》一诗：“宝坻银鱼天下闻，瓦窑青脊始闻君。烦君自入蓑衣伴，尽我青钱买二斤。”^[3]瓦窑头即当时下坞村东的窑上渡口，渡口对岸就是李自沽村。宁河县建立后，这一地区归属宁河管辖。

由于银鱼出产于冬季，所以又称之为“冰鲜”。《宁河县志》载：“冰鲜，为宁邑独产，而银鱼紫蟹亦胜他邑。”^[4]清代乾隆文人关上谋《银鱼冰鲜吟二首》云：“银鱼及冰鲜，忍说宁河出。太息下网人，雪风寒透骨？冰鲜及银鱼，口腹何足慕！围炉把盏人，曾念斯民苦。”^[5]其在《北塘捕鱼辞·其四》中有云：“银鱼肥白是

冬天，凿破层冰出水鲜。寄语衔杯应细嚼，许多辛苦到尊前。”^[6]

银鱼又有金眼银鱼和银眼银鱼之分。所谓金眼银鱼，是黑眼圈金眼珠；银眼银鱼，即黑眼圈白眼珠，金眼银鱼最为珍贵。所谓金眼银鱼是过了某一河段，或是见到什么东西后眼睛就变成了金色，这只是传说而已。其实金眼是银鱼成熟的一种表征，是其生长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雄银鱼较粗壮，雌银鱼的体形比雄的纤细。还有“红脖绿娘”之说，雄的脖子上有几道红线，非常显眼；雌的发绿透亮。银鱼刚出水时，莹澈骨，离水不久，便冻僵成乳白色，闻之有一股新鲜黄瓜的清香味，故有“一条银鱼一锅汤，满屋荡漾黄瓜香”之说。

银鱼不是蓟运河所独有，当时同在渤海湾的海河也有出产。《天津县新志》记载：“鱼类多常品，惟银鱼为特产，严冬冰涸，游集于三岔河中，伐冰施网而得之，莹澈骨，其味清鲜，非他方产者所能比。”“天津卫冬月出银鱼，白如脂玉，京师嗜味者美之，以配鲜笋。”^[7]物以稀为贵，由于银鱼产量小，解放前天津卖银鱼不论斤而论个儿卖，雌雄配对，衬托菜叶，白绿分明，十分喜人。

银鱼纳贡成骚累

蓟运河银鱼并不是明代才有的鱼类，宋金时的史书中就有记载，但它的的确确是明代才有了

[1]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82页。

[2]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六《畿辅杂记》，第137页。

[3] (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纪闻》，第315页。

[4] (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一，第162页。

[5]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951页。

[6][7]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821—822页。

[8] (清)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五，第390页。



知名度，这恐怕与朝廷对银鱼的征贡密不可分。皇室的推崇抬高了银鱼的身份，从而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古代有荐新之礼，即将四季应时的谷物时鲜等献祭于祖先神灵，其中冬季荐鱼是有悠久传统的成规。《国语·鲁语上》中就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将罿留，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之也。”^[1]明代将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朝廷仍延续历代荐新的成规，“凡时物，太常先荐宗庙，然后进御”^[2]，即荐新之后，皇室是要享用这些时鲜的。蓟运河银鱼是时鲜之物，正好可以配合冬季荐鱼的成规。《大明会典》所记录的奉先殿每月荐新物品中，十月即有银鱼一项^[3]。随之，身处北京的皇室贵族就可以享用到以荐新的名义征贡而来的银鱼，并逐渐形成了十二月、正月吃银鱼的习俗。进贡时鲜的名头大大提升了蓟运河银鱼的身份和知名度。

为了保证银鱼按时荐新上供，明代朝廷特地在宝坻设立了专门机构——银鱼厂，管理银鱼的采捕、进献。据《明史》记载：“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征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4]中官即宦官，各种采造之事“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5]，而银鱼厂

历来由中官管理，“其一为贡银鱼，永乐间，岁差入贡九次，后尚膳监差中官二员躬采，遂于北潭等处设厂。梁城所（即宁河）则有椿本银（税种名称），本城（即宝坻）则有柴薪银（税种名称），往复九次，动费千金。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初，巡抚屠疏革。不数年复行，中官愈恣，动托敕书，治以惊散银鱼之罪”^[6]。“乃至冬月椎冰，令渔者跣立打捕，又课富室折乾润囊，民不聊生。”^[7]明代通判范兆祥《夏雾银鲜》诗云：“潮河吞吐海潮回，宫厂黄旗压境开。弦诵喧啾无犬吠，却惊中使打鱼来。”^[8]潮河即蓟运河，宫厂又称内厂，是明朝太监的特务机构，黄旗是太监出行所用仪仗，中使是宫廷派出的使者，多由太监充任。当时在蓟运河畔持黄旗的太监压境，催捕银鱼，连狗都不敢叫唤，其阵势何等威严，而那些光着脚的捕鱼人又是何等艰辛！

为了扩大管辖范围，捞取更多利益，太监们随意扩大征税区域，甚至本不产银鱼的地方也被征收银鱼税，而银鱼厂的数量由最初的南北二厂，变为“县设六厂，各渔户百七十人”^[9]。因此，银鱼之贡成为明代宝坻三大弊之一（其余两弊为工部厂、孳生马）^[10]，被当地百姓看作是“第一骚扰之事”^[11]。

蓟运河银鱼冬季出产，味道鲜美，席上珍

[1] 鲍思陶点校：《国语》，第 85 页。

[2] (清) 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一《志第二十七·礼五》，第 1324 页。

[3] (明)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百一十七《光禄寺》，第 575 页。

[4] (清)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第 1979 页。

[5] (清)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食货六》，第 1989 页。

[6][10] 《天津区县旧志点校》（宝坻县志、宁河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170 页。

[7]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兵部》，第 431 页。

[8]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 809 页。

[9] (明) 谈迁：《枣林杂俎》《中集》，第 487 页。

[11] 袁黄：《宝坻农书》卷四，第 487 页。

品，本应成为地方百姓引以为傲的特产，但是明代的征贡，特别是广设银鱼厂，由中官负责督导多次采捕进贡，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和不尽的痛苦。

时任宝坻县令胡与之有感于此，写了一篇《银鱼说》：“浙之富春山生茶，茶味不下六安、阳羡，富春江生鱼，鱼味比龙江似胜，记所谓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国朝每岁之春，采以进贡。正德间，必内臣采取，居民不安，浙之府县，并望风萎靡矣。独臬金韩公邦奇奋然愤焉，欲奏除此害。乃作歌曰：‘富阳之鱼，富阳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闻诸朝，其时武庙以为讪上，欲中以奇祸，后幸而豁免，亦自分永弃矣。及嘉靖初，朝廷闻忠直起官，位至卿孤，天下咸贺圣天子之能起废旌忠。公之直道，不容于前，而克伸于后也。士君子各抱正气，以行恺悌爱民之德，而公之令名亦无穷矣。余为宝坻凡六月，余视宝坻银鱼，实有类于富春之茶鱼。而居民之不安，殆有甚焉者矣。余弗能为韩公之所为，要亦服韩公之义也，于是乎书。”^[1]胡与之将官厂采取银鱼与正德间内臣采取富春茶鱼相比，认为其对民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叹无能阻止，只在此发出感慨。

至清代前期，宁河的银鱼仍“频年纳贡，民几不堪”^[2]。乾隆时文人冯城在《冰鲜行》描写了渔民冬季捕捉冰鲜的艰辛：“水泽腹坚冰穹窿，四野栗烈吹寒风。长河驱车如复路，漾漭直压冯夷宫。渠阳周遭汇众泽，势与江海相萦通。冬十二月万物肃，水骨瘦削森青铜。鲲

鲕遁逃科斗匿，晶壁屹立撑于中。渔人冲寒临巨壑，凭陵纠拒何豪雄！手足皲瘃指将墮，阴气惨澹塞长空。回堤轰轰浩呼汹，如凿鸟道开蚕丛。訇然冰开冰鲜出，崩崖转百声隆隆。以网承溜收小媵，颇谓人力齐天工。岂知冻皴皮肉死，河伯悯此苍生穷。”^[3]宁河古称渠梁，渠阳指宁河的南面，即蓟运河下游地区。由于朝廷催捕，宁河打鱼人只好在寒冬腊月，身着单薄的衣服，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冰封的蓟运河里凿冰捕鱼，手足冻裂，有的甚至形成冻疮或“指将墮”，而那些享用冰鲜的“高堂狐裘披蒙茸，闭门围炉烈火烘”^[4]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有谁可怜这些忍饥挨冻、瑟瑟发抖的打鱼人？

纳贡裁汰得民心

“同治二年，邑令吴，详请裁汰，民德之，邑人咏诗以记其事。诗云：‘冰鲜味美压他乡，纳贡因之价倍昂。记取吴公裁汰日，从今闾里沐恩长。’”^[5]“邑令吴”即同治二年（1863）来宁河县任县令的吴梦曾（号傅岩，安徽泾县人），因他体恤民情，多次上疏裁汰银鱼税，终得朝廷批准，故百姓感念其德，“咏诗以记其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河、蓟运河等河道里仍有银鱼出没。后来，随着海河防潮闸（1958年建成）、蓟运河防潮闸（1968年建成）的修建，阻断了银鱼洄游之路，再加环境污染，银鱼几乎绝迹了。

（作者单位：宁河区档案馆）

[1]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731页。

[2][5]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951页。

[3][4] 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宁河县志译注》，第823页。

天津市档案馆多措并举做优做强微信公众号 着力提升关注度和影响力

多年来，天津市档案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方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四个好”“两个服务”目标要求，结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扎实履行存史资政育人的职责使命，学习先进地区经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做优做大做强“天津市档案方志”微信公众号，着力提升关注度和影响力，助力档案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倾情助力服务民生，传递档案方志温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事关天津发展和关系民生紧密领域，在每年举办的“6·9”国际档案日和“9·5”档案开放日系列活动中，依法选取馆藏已满25年的民生档案目录，通过天津档案方志网和“天津市档案方志”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市民群众登录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即可足不出户查阅想了解的档案资料，更好地满足了社会公众对档案的利用需求。2023年“6·9”国际档案日和“9·5”档案开放日期间，分别公布了民生档案目录1.3万余条和1.4万余条。

上线优秀编研成果，讲好档案方志故事。深挖馆藏档案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好编研成果，定期从《天津史志》《津门掌故》等期刊书籍中选取兼具知识性、思想性、可读性的文章刊发，触发读者城市记忆，增进读者文化认同，讲述档案方志故事，使读者更有兴趣、更持久、更专注地通过“天津市档案方志”微信公众号了解馆藏档案方志中记载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将微信公众号打造成天津市档案馆的响亮文化名片和宣传阵地。

推送系列音频视频，扩大档案方志影响。为进一步促进宣传形式多元化，不断增加宣传渠道和平台，陆续在“天津市档案方志”微信公众号推送了联合拍摄的党史纪录片《曙光》

和人文纪录片《海河》，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系列微视频之近代海河流域治理档案、“永久黄”企业档案，《国家档案遗产中的天津传奇》——“城市记忆”电台节目、天津经济广播“国际档案日”特别节目，以及创作的“踏海破壁——青年周恩来的报国之志”等音频和视频，有力提升了文化自信自强。

加载大型展览预约，加大档案方志宣传。为方便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群众更加快捷地在微信公众号平台预约馆内举办的线下展览，“天津市档案方志”微信公众号加载了预约天津城市记忆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的功能，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提升档案方志社会服务能力。2023年以来，共接待参观单位（或党支部）500多个，参观人数25000余人次，充分发挥了全国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和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开展有奖知识竞答，普及档案方志知识。在今年“9·5”档案开放日之际，天津市档案局联合市档案馆面向全市开展了一次“9·5”档案开放日有奖知识竞答活动。此次答题活动的题目设置多样化，涵盖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方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档案方志法规条例、档案基础知识、天津历史等内容，累计超过2.5万人参与答题活动，市档案馆为获奖者寄去了精美的档案文创产品，不仅为广大市民群众普及了档案方志知识，也促进了天津历史文化的传播。

下一步，天津市档案馆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方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挖馆藏档案方志资源特别是红色资源，充分利用好微信公众号这一新媒体平台，进一步加大向社会宣传力度，切实讲好党的故事、中国故事、天津故事。

（市档案馆宣传部）

市档案馆组织召开 2023 卷《天津年鉴》定稿会

11月6日下午，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2023卷《天津年鉴》定稿会，研究审阅2023卷《天津年鉴》样书。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天津年鉴》副总编辑吴爱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地方志馆、年鉴指导部、方志指导部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前，《天津年鉴》编辑部已向馆领导、有关处室报送了2023卷《天津年鉴》样书，征求修改意见。会上，市地方志馆年鉴编辑部负责人汇报了2023卷《天津年鉴》的基本情况以及对标精品年鉴作出的具体调整。与会人员认真审阅、热烈讨论，从篇目设置、文字表述、图片选取、版面编排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及工作建议。

市地方志馆一行赴云南省、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学习调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天津市地方志馆一行四人赴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进行学习调研。

11月22日，天津市地方志馆信息室主任岳宏一行与云南省地方志办交流座谈，云南省地方志办主任赵增昆主持座谈会。会上，赵增昆着重介绍了云南省地方志信息化工作，岳宏介绍了天津市地方志馆的基本情况。随后，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围绕期刊编辑出版、志鉴数字化、方志馆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

23日，天津市地方志馆信息室主任岳宏、《天津年鉴》编辑部主任王国新一行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座谈交流，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桑荟出席。座谈交流会上，桑荟从智慧方志馆建设、精品年鉴创建、方志文化宣传、史志馆联盟、《江苏地方志》杂志等

吴爱民对2023卷《天津年鉴》编辑工作给予肯定，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落实修改意见，并对2024卷《天津年鉴》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完善年鉴框架结构，加强学习相关文件、资料，掌握全市大事要事，密切与供稿单位沟通，对标精品年鉴，编制出内容全面、分类科学的框架结构。二是切实提升稿源质量，建立工作机制，调动供稿积极性，确保稿件质量，为创建精品年鉴打牢基础。

会后，《天津年鉴》编辑部召开会议，梳理与会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核实稿件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2023卷《天津年鉴》高质高效出版。

（市地方志馆）

方面，介绍了近年来江苏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岳宏介绍了天津市地方志馆的基本情况，王国新介绍了《天津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情况。随后，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业务交流。24日，天津市地方志馆一行参观了江苏省方志馆“志载光华”——江苏省情展，并与江苏省方志馆副馆长沈萌微就实体方志馆建设进行交流。

通过“走出去”学习调研，同志们一致认为，此次活动了解了云南、江苏两省地方志工作基本情况，学习到全国先进省份期刊编辑出版、精品年鉴创建、方志数字化建设、方志馆建设、书籍系统管理及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开拓了视野，启发了思路。大家表示，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与其他省市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合作交流，促进天津市地方志馆工作再上新水平。

（市地方志馆）

市商务局持续推进《天津市志·商业志（上卷）》编修工作

市商务局持续用力抓好志书编修工作，近日召开专题会议，总结《天津市志·商业志（上卷）》前期编纂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编纂工作。

会上，志书编委会有关同志从项目政采、确立篇目、收集资料、强化督导、完善保障等方面总结汇报了志书编修情况。负责编纂的专家老师们介绍了编纂进度情况，并就志书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相关建议进行汇报。

负责志书编修工作的局领导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抓好修志工作，助力商业发展。立足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事业发展，通过编修商业志书，厚植深耕，对商业历史的脉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以史鉴今，促进本市商旅文结合

的发展。二是盯住时间节点，突出志书质量。志书编修工作任务繁重、工作量浩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把各项工作往前赶。要积极承担责任，把每项工作做好做细，树牢精品意识，保质量保时效完成编修任务。三是加强信息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局领导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及时掌握编修工作情况，及时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负责编纂的同志要积极主动向局领导汇报工作，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意识，大力做好服务保障。同时，要加强与市地方志办沟通交流，积极汇报工作，争取指导帮助，主动接受监督检查。

（市商务局）

市委老干部局全力推进老干部工作志书编修

日前，天津市委老干部局召开局务会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和老干部工作重要论述，专门听取志书初稿编写工作汇报，围绕全力推进老干部工作志书编修提出要求、作出安排。

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志书编修工作，结合实际深入谋划部署，上下同心，举全局之力推进落实，志书编修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目前，基本完成志书初稿编写，共8篇18章52节，约50万字，得到有关专家团队肯定。

会议强调，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持之以恒、聚精会神打造精

品志书。一要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志书编修全过程，树牢重视质量、追求卓越的精品意识，领导干部亲自抓，各处室部门各司其职、全力配合，形成抓落实合力。二要做到保持干劲不松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发扬“严、细、深、实”工作作风，抓紧拾遗补缺、收集整理资料，做实志书序言、概述、凡例、索引，完成好后续工作。三要做到持续盯住不放手。盯紧任务、盯紧责任、盯紧环节、盯紧进度、盯紧质量，质量优先、稳步推进，全力打造天津老干部工作精品佳志。

（市委老干部局）

河西区积极开展方志“六进”系列活动

为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源服务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认真履行方志“存史、资政、育人”使命，今年以来，河西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扎实开展方志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书屋、进讲堂“六进”活动。

通过与区人大、区政协、区教育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各街道各社区及其他涉商活动的有关单位合作，向河西区图书馆、天津图书大厦、各街道社区图书馆、天塔西岸书斋、区养老院、燕园酒店、皇冠酒店等河西区二十多家公共文化事业单位、酒店赠送《河西区志（1979—2010）》，放在涉外商务酒店大厅及阅览区、政务服务大厅、各街道社区图书馆，并通过将志书赠送给河西区企业家的形式，方便涉外涉商旅客了解河西历史文化，优化河西区营商环境服务，充分发挥区志宣传河西、招商引资的作用。

召开全区各部门、各单位部门志、街道志业务培训会，向全区各单位发放《河西区志（1979—2010）》，方便全区各单位通过志书了解河西历史，开展本部门、本街道志书编修工作。通过发布公众号的形式，将区志借阅方式及电话展示给市民，打通志书借阅渠道，在区档案馆办事大厅设区志、年鉴展示区，方便河西居民借阅区志及年鉴。

活动开展以来，河西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先后向机关、学校、企业、社区、武装部等捐赠《河西区志（1979—2010）》累计1200余册。通过方志文化“六进”活动，让志书走出档案库房，走向群众，发挥志书优化河西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作用，助力河西区“1+10”实施方案落实落地，促进地方志资源全民共享，营造起读志用志的良好氛围。

（河西区档案馆）

东丽区档案馆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捐赠仪式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11月10日上午，东丽区档案馆举行天津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漕运船模制作技艺捐赠仪式。漕运船模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翟俊正与区档案馆全体人员参加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馆领导介绍了区档案馆的基本情况和近年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相关情况。捐赠人翟俊正详细介绍了漕运船模制作历史及制作技艺等情况，并同区档案馆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捐赠交接。天津电视台对捐赠仪式及相关活动进行了专门采访，并在天津文艺频道《文化关注》栏目予以播出。

近年来，东丽区档案馆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充分挖掘本区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并结合地方志工作特点，收集梳理非遗文化编入地方志书，既丰富了东丽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又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传承力。今年8月起，在馆领导与传承人积极沟通协调和大力帮助下，区档案馆年鉴编纂科工作人员同天津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漕运船模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翟俊正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实地参观了漕运船模工作室，了解漕运船模制作流程和相关工艺。

东丽区档案馆将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开发和利用，助力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为推动东丽区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提供有力保障。

（东丽区档案馆）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档案馆一行到西青区档案馆开展调研交流

11月9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档案馆一行到西青区档案馆就档案馆建设和布展情况开展调研交流。由龙岗区档案馆馆长黄乐平带队的一行三人先后参观了西青区档案馆查档大厅、“村志岛”“西青记忆”主题展和“百年党史”专题展，并对档案实物库房、方志图书资料库及智能化档案库房进行了参观。西青区档案馆副馆长范秀敏及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对西青档案馆建设功能、资料征集和库房建设等情况进行详细介绍。随后，双方就档案馆建设和布展情况进行了热烈融洽的座谈。

座谈会上，西青区档案馆相关负责同志向龙岗区档案馆一行重点介绍了方志馆建设筹备、展陈大纲制作和布展设计等情况，并对龙岗区档案馆一行提出的有关建馆和布展问题进行了悉心解答。双方还就地方志队伍建设方志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了探讨交流。

此次座谈达到了增加彼此了解，拓宽工作思路，建馆与布展经验借鉴的实效。会后，双方交换了各自编写的志书、年鉴以及其他地情资料书籍。

(西青区档案馆)

武清区地方志办举办镇街志推动会暨《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经验分享会

为推动武清区志书编修全覆盖工作，保留乡土文化记忆，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挖掘历史智慧，充分发挥志书存史、资政、育人作用，11月10日上午，武清区地方志办举办镇街志推动会暨《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经验分享会。大碱厂镇、上马台镇、城关镇、陈咀镇、石各庄镇、杨村街道6家单位志书编修工作分管领导与工作人员及武清区地方志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河西务镇人大主席杨莉受邀分享《河西务镇志》编修工作经验，武清区档案馆副馆长、区地方志办主任贾建鹏主持会议。

会上，杨莉分享了《河西务镇志》编修过程中总结的工作经验，指出修志应遵循科学精神，着重介绍了在镇志编修过程中形成的月度

碰头会制度、季度汇报制度及志稿统稿会商制度、会议纪要制度、微信工作群沟通制度等工作机制，强调要严格把握志稿标准规范，按照中国名镇志撰写体例确定篇目结构，根据名镇志定位组织内容，选择材料，通过专业机构、群众等多种途径丰富材料来源，并提升材料真实性及准确性。

会后，区地方志办工作人员为参会镇街提供相关制度文件并现场答疑解惑，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给出具体指导意见建议，解答了镇街提出的各类问题，并指导各镇街深入挖掘区域特色和地情资料，为规范开展志书编修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武清区地方志办)